

商代殷都的族居特点与商的王?

著者	王 震中
雑誌名	王権と都市
巻	33
ページ	43-81
発行年	2008-03-01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商代における殷都の族居特点と商の王権 Residential Space Arrangements in Shang-Era Yindu and Shang Kingly Authority
URL	http://doi.org/10.15055/00002516

商代殷都的族居特点与商的王权

王震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在商王朝的历史中，一般将盘庚迁殷至商纣王的灭亡这273年的时间称之为商代晚期¹，晚商王都因在河南省安阳的殷地，故也被称作为“殷都”。以往的研究所说的殷都，一般是指以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宫殿区为中心的王都（图1），而近年来随着洹北商城的发现（图2，图3）²，学者们发现，所谓“盘庚迁殷”所迁之都城是河南省安阳市的洹北商城³，位于洹河南岸小屯村的宫殿区则是武丁以来殷都的中心区（图1）。洹北商城虽然是近年来重大的考古学发现，但对其的发掘还是初步的，而以小屯宫殿区为中心的考古学发掘则有八十年的历程。八十年来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包括宫殿宗庙和王陵在内的大量的房屋建筑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遗迹以及墓中所出土青铜器上铸有的各类族徽铭文，再联系相关的甲骨卜辞，为我们剖析晚商王都的族居特点，它的族氏结构及其与商王权的关联，提供了多方面具体而丰富的材料，为此这里所论述的“商代殷都的族居特点与商的王权”，主要说的是以安阳小屯宫殿区为中心的商王武丁至商纣时期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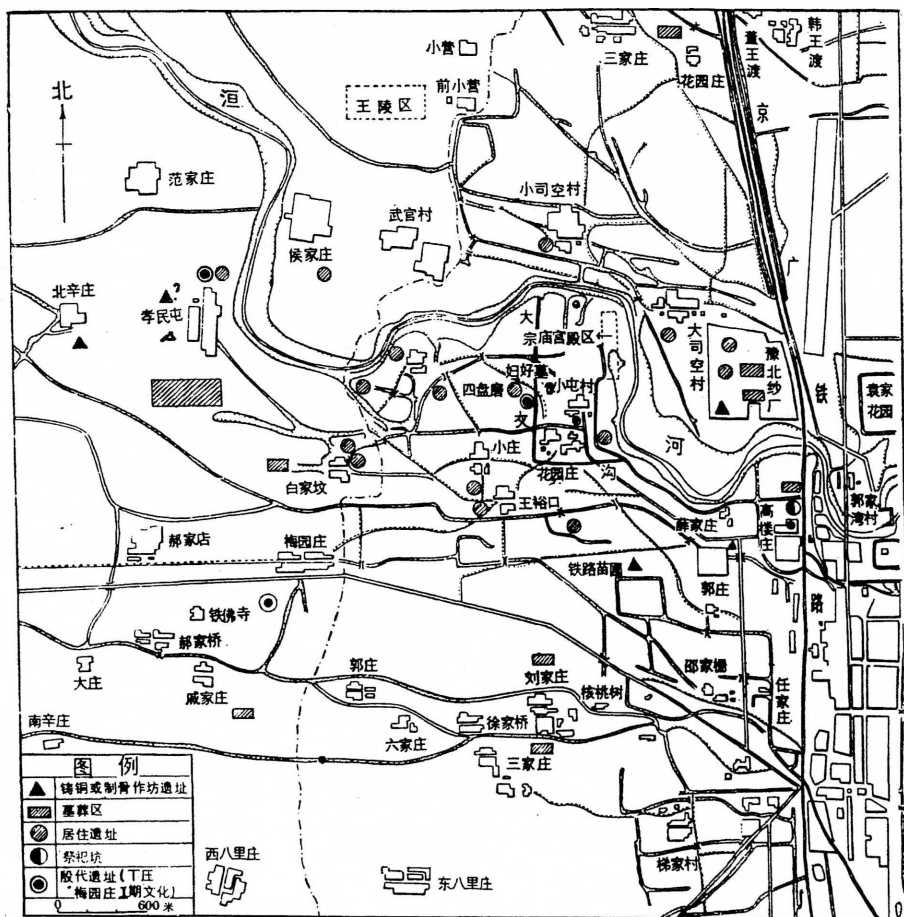


图1 殷墟遗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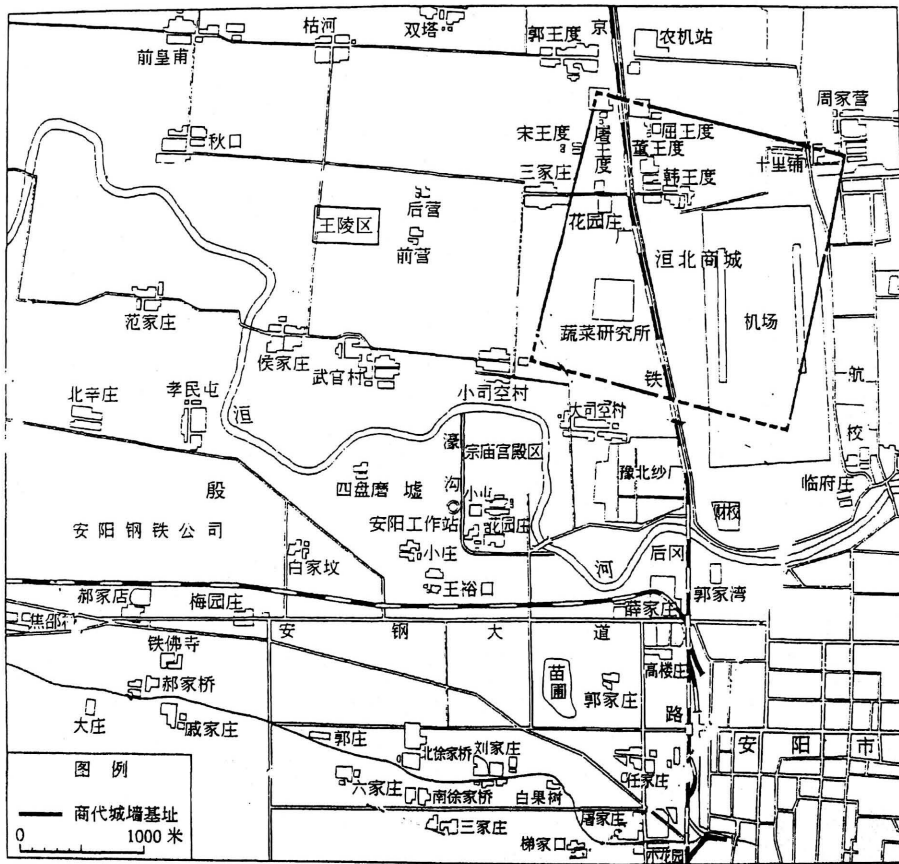


图2 殷墟遗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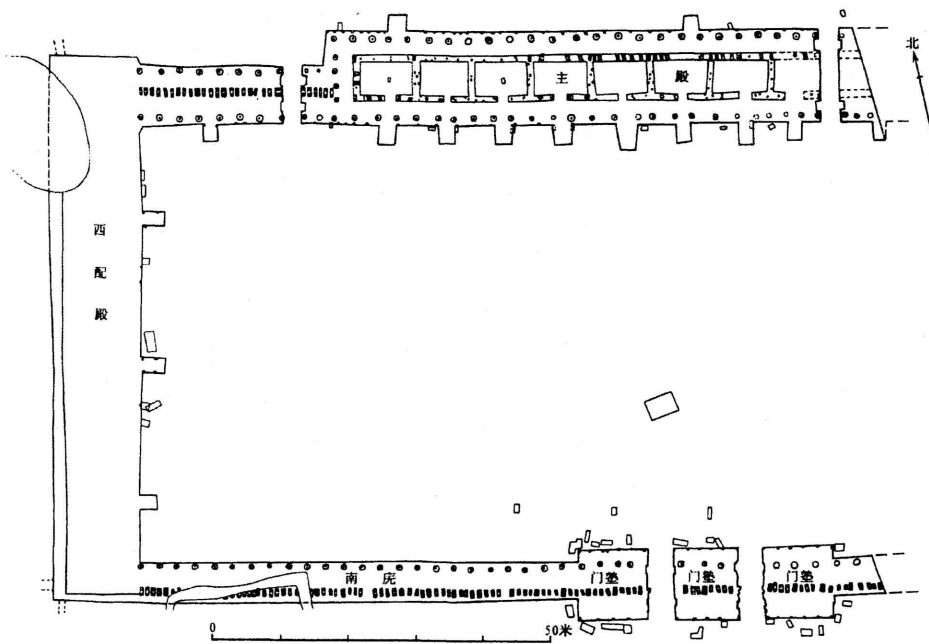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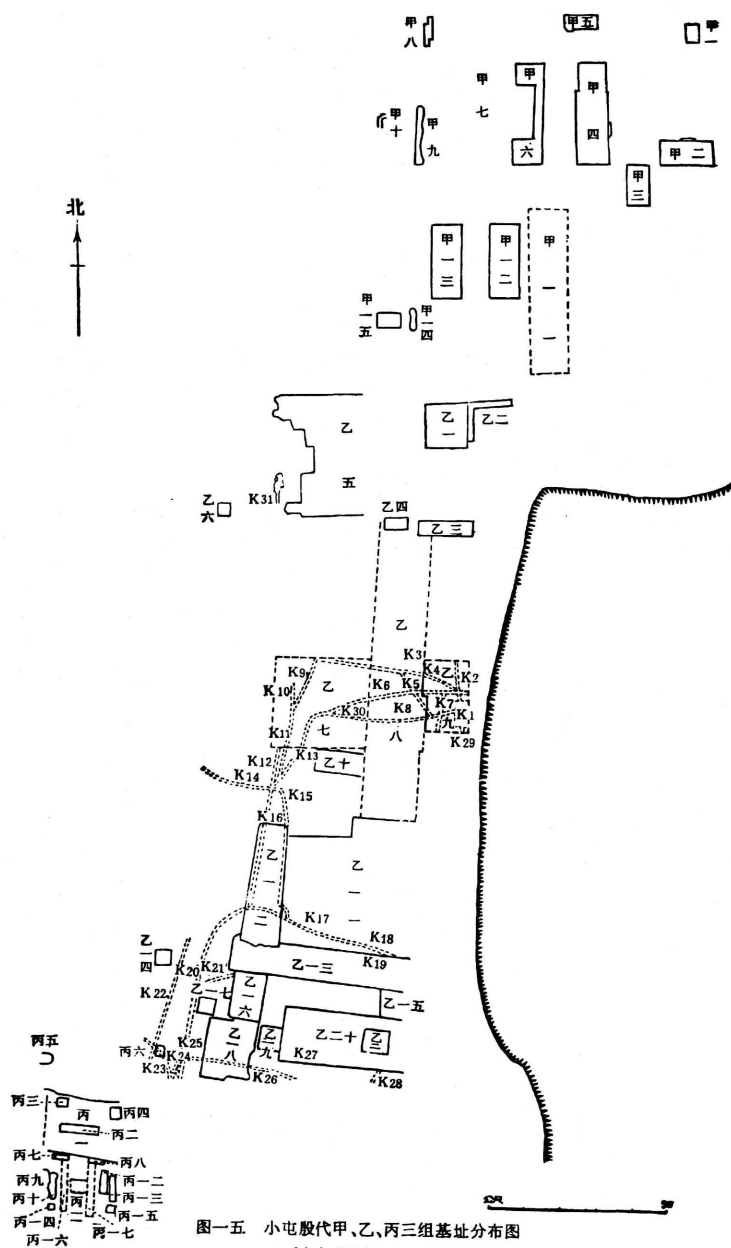


图3 洹北商城1号宫室 副本

一，安阳殷都的大杂居与小族居

在被称为殷墟的晚商王都中，经过八十年的考古发掘，我们看到在总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⁴，除了宫殿区和王陵区外，大量的的是散布在四面八方的其他族众居住的居址与手工业作坊遗址。而这些族众的居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则呈现出“大杂居小族居”的特点。所谓“大杂居”是说在整个殷墟交错杂处居住着许多异姓的族人，呈现出一种杂居的状态；所谓“小族居”是说每一族在较小的范围内是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族居族葬的。

殷墟的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水南岸小屯村一带（图1），虽然以20世纪30年代发掘出的被称为甲组，乙组，丙组的53座宫殿宗庙坛墀之类的夯土建筑基址（图4）⁵和1981年在乙二十基址南约80余米处



图一五 小屯殷代甲、乙、丙三组基址分布图
(略去原图中之等高线)

图4 宫殿区甲乙丙组基址

新发现的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⁶而著称，但殷墟的宫殿宗庙区无论是布局还是内涵都不同于偃师商城的宫殿区（图5，图6，图7）。在殷墟的宫殿区内的遗迹，并非仅仅是宫殿宗庙之类，20世纪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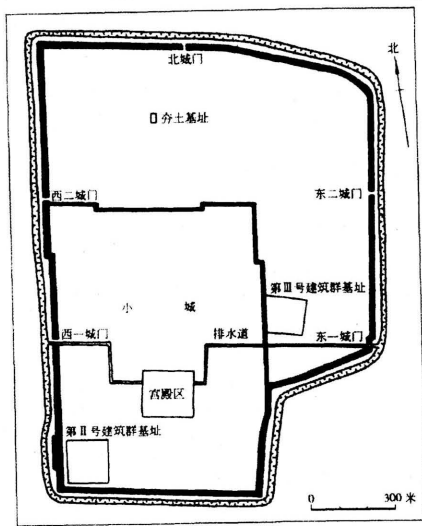


图5 偃师商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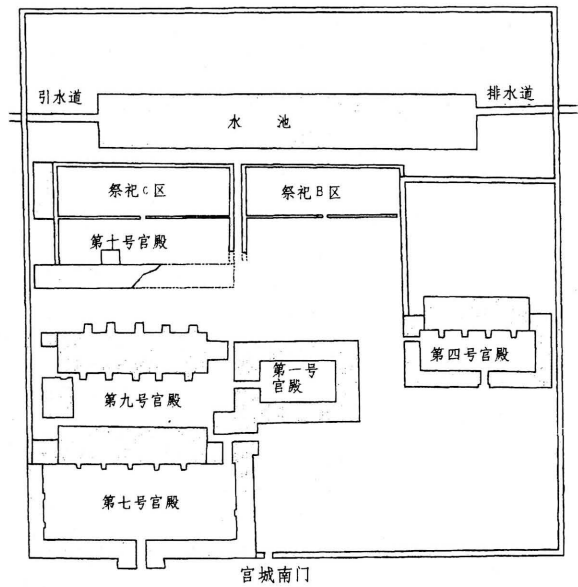


图6 偃师商城宫城第一期主要遗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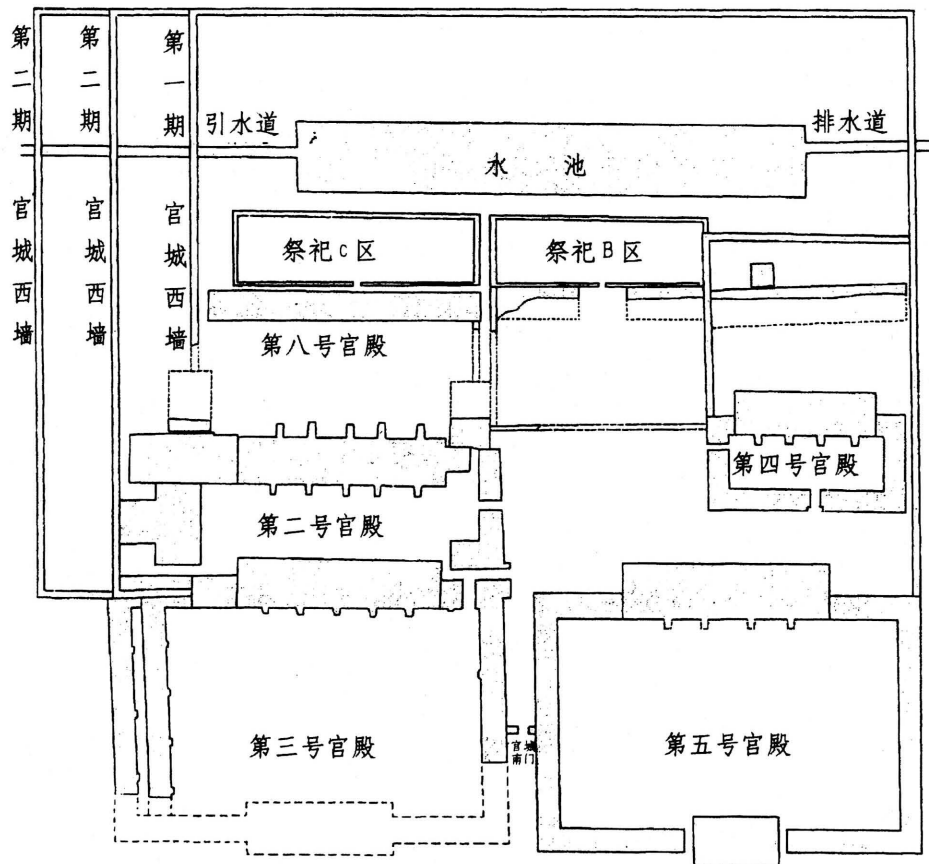


图7 偃师商城宫城第三期主要遗迹图

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考古学者在小屯西北地，距离丙组基址向西约130米的地方，又发掘了含有大量小型房屋，窖穴，墓葬在内的50余处基址⁷，著名的妇好墓和出土有“子渔”，“显侯”（征侯）等五种铭文的18号墓以及出土有“韋”字铭文的17号墓，就在其中。此外，在这一带的1座地穴式和1座半地穴式的房子里，还出土有玉，石雕刻艺术品，石料和磨石等遗物，表明这里有一处制玉手工业作坊⁸；最近在甲五基址西北不远处发现有一个玉料坑⁹，说明在宫殿区的核心部位也存在制玉手工业作坊的可能。此外，20世纪30年代，在宫殿宗庙区乙组基址的乙五基址下压的灰坑中曾出土铸造铜器的陶范2506块，在甲组基址的甲一，甲二基址下层也有陶范出土，在甲七，甲十基址下有大量的铜炼渣¹⁰，这表明宫殿宗庙区的乙五基址所在地在建筑乙五宗庙宫殿前，有可能是一处铸铜手工业作坊。还有，2000年12月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村南的花园庄村东钻探，发现商代夯土基址和灰坑多处以及10余座商代墓葬，并发掘了其中一座编号为54号的显赫贵族墓葬，墓中出土青铜器等各类随葬品570余件，许多青铜礼器上都铸有“亚长”族徽铭文¹¹。这些都说明所谓宫殿宗庙区，它还包含王室成员墓（如妇好墓），贵族墓（如M54，M18，M17等），一般的“王众”小墓，以及由王室直接控制的制作玉器，铜器的手工业作坊，储藏粮食等物的窖穴和普通的居址等。所以，宫殿宗庙区既表现出宫殿宗庙较为集中，亦呈现出王室所在的那部分王族的生活与生产状况，它也是作为王族族居的场所之一。

王陵区位于洹水北岸武官村北（图8），由13座属于王陵的带墓道的大墓，近1500座排列密集而整齐的祭祀坑和一些大墓旁的陪葬墓所组成。王陵区内数量庞大的祭祀坑是经长时期频繁使用形成的¹²，这说明王陵区既是埋葬商王的陵地，也是当时商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所，这种较单纯的宗教内涵，显示了它的神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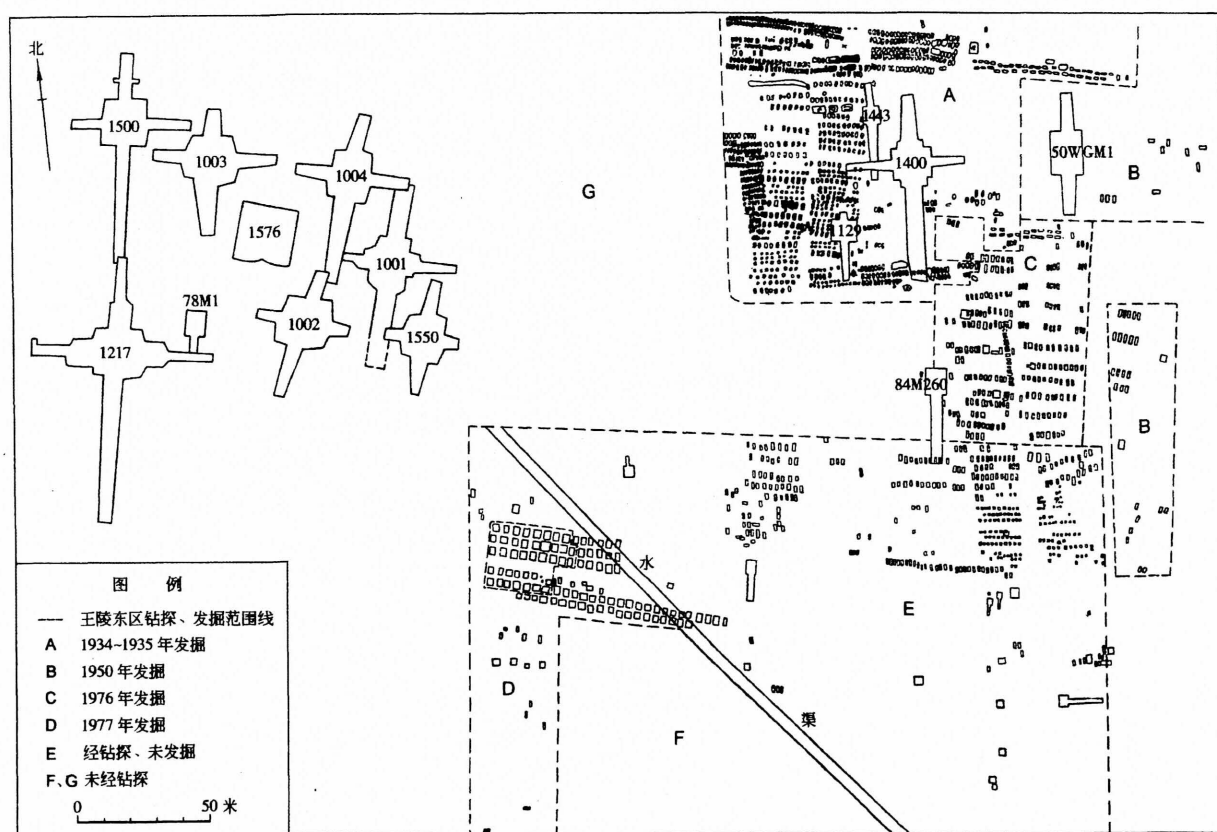


图8 殷墟王陵区大墓及祭祀坑

宫殿区和王陵区之外，殷都“大杂居小族居”，主要体现在众多族众的居址，墓地和手工业作坊的分布所呈现出的分散性与族居性相结合的特征。

首先以殷墟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为例，尽管这类遗址在数量上发现很多，但我们无法把哪一处说成是手工业作坊区，其原因即在于：一是它们分布的很分散，在殷墟的东南西北四面都有（图9）。例如，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遗址位于小屯村南约1公里处；薛家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位于苗圃北地东北；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位于小屯村西北约2.5公里；北辛庄南地的制骨作坊位于殷墟西北；大司空村东南的制骨作坊，位于洹河东岸。二是它们每每与较小的族居形态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遗址一带发现的“亚鬲”，“宁趾”“鬲”等族徽铭文多达四五种之多，说明这里的族居是由多个家族所构成的¹³。再如，大司空村东南地，发现有1380平方米的手工业作坊范围，在这一带即豫北纱厂及其附近还发掘有900座分区成组分布的殷代墓葬¹⁴，属于又一处聚族而葬的“族墓地”，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又在豫北纱厂内发掘出一组贵族的宫殿宗庙夯土建筑基址群¹⁵。这里墓地的墓葬中出土有“洋”，“古”，“何”，“见”等十多种不同种类的族徽铭文¹⁶。将大司空村东南地的制骨作坊与这里的贵族宗庙建筑群，带墓道的大墓，含有数百座墓葬“族墓地”以及十多种不同种类的族徽铭文综合考虑，似乎可以得出：大司空村，豫北纱厂这一带族居族葬有“洋”、“古”，“见”等十多个贵族族氏，大司空村的制骨作坊只是居住在这里的某一贵族族氏中的一种手工业生产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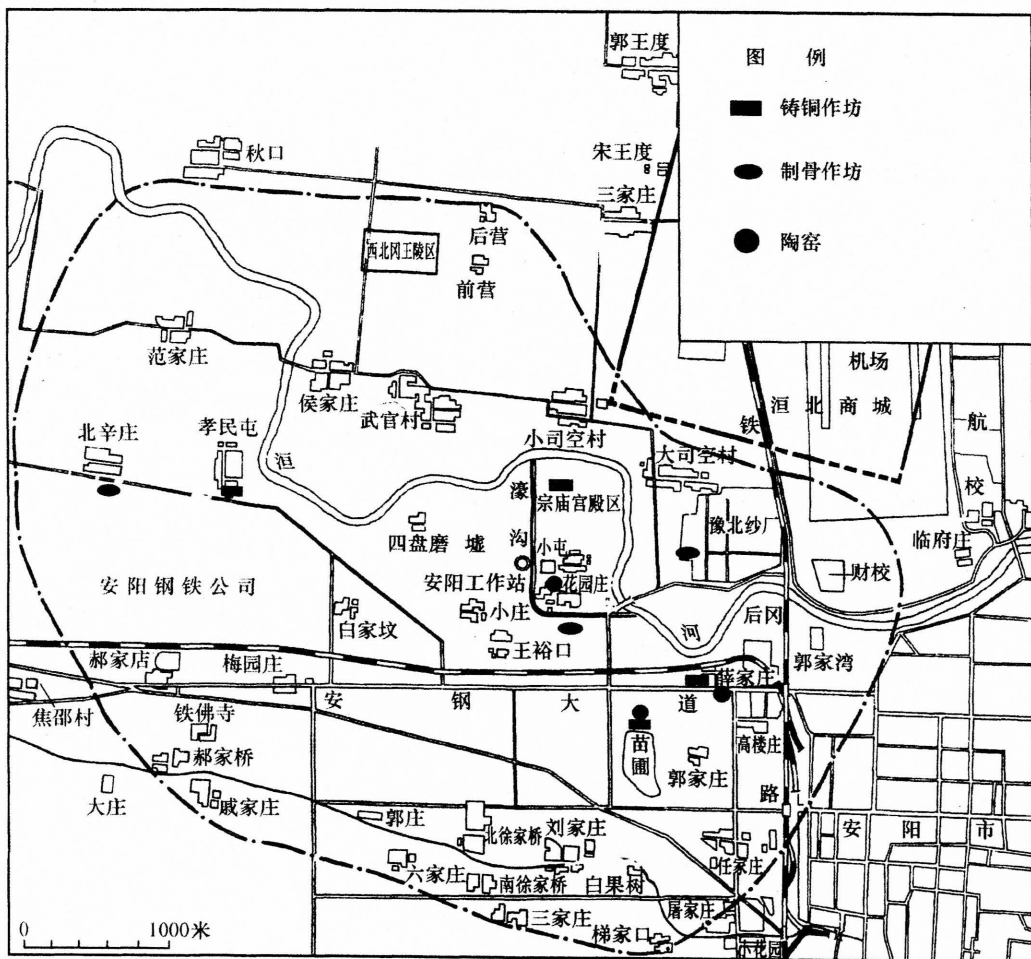


图9 安阳殷墟手工业作坊遗址平面图

上述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多数存续的时间都较长，如苗圃北地的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年代始建于殷墟一期晚段，其后规模不断扩大，一直延续到殷代末年的殷墟四期。薛家庄手工业作坊遗址，也是从殷墟文化第二期延续到三、四期。孝民屯村发现的由近百座半地穴式房子组成的平民村落，使用年代为殷墟二期；2003～2004年发现的铸铜遗址主要为殷墟文化第三、四期；清理的1177座墓葬，绝大多数也属于殷墟三、四期，个别为殷墟一、二期¹⁷。既然存续的时间长，而又以族居的形式居住，那么，它们显然属于世工世族。这种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从事某种手工业生产的形态¹⁸，当属于商代手工业专门化生产的一般形态，《左传》定公四年所说的殷遗民中的条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陶氏，施氏，繁氏，铎氏，樊氏，终葵氏等，就应该属于这种情形。而这种世工世族又是按照大杂居小族居分布的，所以，各族的手工业作坊是不能像宫殿区王陵区那样集中在某一片区域的。只是，有的家族或宗族只从事某一种手工业，也有的则在主要从事某一手工业的同时，也兼营其他种类的手工业。这种大杂居小族居决定了殷都手工业作坊分布的分散性。

除了族居的世工世族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还发现许多其他的族居族葬遗址。如位于小屯村西约2公里的白家坟遗址，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既发现有较集中的墓葬，也发现多座夯土房基，数十个窖穴，灰坑和水井，在一处夯土建筑基址下发现长约16米的陶排水管道¹⁹。有学者认为殷墟西区第七区，第一区的墓葬靠近白家坟遗址，它们与白家坟遗址属于一个族邑，其墓葬中出土的“共”，“告宁”，“子韦”，“克”等族氏徽号和带墓道的大墓，车马葬等表明这是殷墟中一些重要的望族²⁰，其族属可能包含有“共”，“告宁”，“子韦”，“克”等多个族氏贵族。

位于小屯之南的苗圃南地，曾发现分布有商代灰土层，灰坑和50余座墓葬。在其中的M47，M58和M67墓葬中都出土“𠄎”这样的族徽铭文²¹。这群墓葬既然仅出这一种徽铭，说明苗圃南地这片墓地是“𠄎”族的墓地，而且由M47所出土的铸有“𠄎己”的大鼎看，拥有此鼎的墓主人有高贵的身份，也反映“𠄎”族在当时有较高的地位²²。

位于殷墟西南的郭庄村北，1986～1987年发掘殷代墓葬167座，有9座墓出土青铜礼器。这片墓地中出土族徽铭文七种，有“羊”，“单”，“光”等²³。“羊”族徽铭文在梯家口村西殷代墓地中曾有发现²⁴，“光”族徽铭文在范家庄村南殷代墓地也有发现，以前著录也有记载²⁵。“羊”，“单”，“光”等多种族徽铭文在郭庄村北的发现，说明这一带至少是几个不同族氏的族葬地。

位于苗圃之东的郭家庄，1982年～1992年发掘出191座商代墓葬，出土有“亚址”，“亚胡址”，“亚胡止”，“中”，“𠄎”，“兄册”，“作册兄”，“乡宁”等族徽铭文²⁶，可见郭家庄村也属于多个族氏的族葬之地。

位于小屯村南约2公里处的北徐家桥村北，刘家庄村北和村南也是贵族族居地，如1992年，1996年，在北徐家桥村北发掘出殷代墓葬70余座，发现殷代夯土房基3座，其中F1和F2夯土建筑面积均在30平方米以上²⁷；2001～2002年，在北徐家桥村北又发现和发掘出一处规模宏大，分布密集，建筑形式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基址群²⁸。在这一建筑群体的周边也发现有商代建筑基址的分布，表现出共处的紧密关系。像徐家桥村北这样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的规格和建筑群的规模，表明这一带所居族氏的地位与实力都是较高的，其族众的人口数量也当不少。

在刘家庄村南发现有殷代墓葬62座²⁹，有殷代夯土基址一处。刘家庄村南的这片墓地出土的铜器中有“息”³⁰，“史”，“夕”三个族徽铭文，说明刘家庄村南的这片墓地可能是这三个族的家族墓地。

刘家庄村北遗址发现有灰坑，窖穴，房基，水井，道路，墓葬，其中发掘的殷代墓葬达195座³¹。在出土的铜礼器16件中，有4件铸有“举父癸”三字，“举”是族徽铭文，“举”³²字在过去的著录中

记载颇多,说明“举”在当时是一个大族,在殷墟晚期,刘家庄村北地一带有“举”族的墓地,也发现有灰坑,窖穴,房基,水井,道路,表明这一带也是“举”族的居族葬地之一。

在刘家庄,徐家桥东南方向的梯家口村西,1985年以来发掘殷代墓葬近30座³³,在这处墓地中的M3所出铜鼎内有族徽铭文“羊觶”,这一带殷代文化遗迹分布有灰层,灰坑,窖穴等,表明梯家口村西是“羊觶”之家族族居族葬之地。

在殷墟小屯村西南约4公里的东八里庄村东,1991年以来发现有商代道路,灰坑和5座殷墓,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爵上铸有“𠄎己”。“𠄎”是族徽铭文,过去著录中也很多,近年在殷墟苗圃南地,戚家庄村东地等墓地中,均发现有“𠄎”族徽铭文,这一方面说明“𠄎”族在殷墟的居地不止一处,另一方面说明东八里庄村东的这片墓地只是居住在这里的“𠄎”的一个家族的墓地。2001年春,八里庄村北发掘了一处晚商遗址,发现有商代大型灰坑,20余座商代墓葬(其中有4座保存完好的商代贵族墓葬),还有1座房基面达100多平方米的较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³⁴,应为当地贵族的居所。与东八里庄村东的墓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带的居址与墓地,很可能即为“𠄎”族中一个家族的族居族葬之地,其族人中有贵族,亦有平民。

在八里庄之北,位于殷墟西南的戚家庄村东遗址,1982~1984年发现殷代墓葬197座,墓地中出土的铜器有43件带有铭文,分属于9种不同的铭文,包括“爰”,“宁觶”,“钺觶”等。其中,M269墓葬出土带有“爰”徽铭的铜器有25件,M63出土带有“宁觶”徽铭的铜器7件,M235出土带有“钺觶”徽铭的铜器有3件。这一带除分布较密集的墓葬外,还有殷代的灰土层,灰坑窖穴等遗迹,说明这一带在殷商晚期,人口比较稠密,由所发现的“宁觶”,“钺觶”,“爰”等族徽铭文可以判断,戚家庄村东这一带是“宁觶”,“钺觶”,“爰”等族氏族居族葬之地³⁵。

位于殷墟西北边缘的范家庄村南,1997年发现殷墓11座,分布比较集中。还发现商代灰土层,灰坑,窖穴等遗迹。墓中出土的铜器上有“光”字族徽铭文³⁶。“光”的族徽铭文在以前著录的殷墟铜器中就有记载³⁷,1987年在殷墟郭家村北殷代墓地中也发现带有“光”族徽铭文的铜器³⁸,范家庄村南的“光”族墓地,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郭家村北“光”族墓地属殷墟文化第四期。这两处家族墓地的族属被认为是有关联的,仅就范家庄村南遗址而言,它也是一个家族的族居族葬之地。

总括上述殷墟的布局的特点,第一,殷墟有一个中心,它就是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它在殷墟布局中处于中心的地位。近年在宫殿区内发现有池苑水系部分³⁹,说明这里除宗庙宫殿之外,也有池苑水榭,这是为满足王室生活多方面需求所致。这里的池苑水榭的布局之所以不像偃师商城那样很规整地分布在宫室的北边,显然是为了适应近旁的洹河及其蜿蜒流淌的地理环境,它反映出殷人因地制宜的规划意识。

第二,在宫殿区及其附近安排有王室和贵族墓葬,是殷墟布局的另一特点。例如,在小屯村西北分布有妇好墓和出土有“子渔”;“𠄎侯”(征侯)等五种铭文的18号墓,以及出土有“韋”字铭文的17号贵族墓等;在小屯村西,今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内也发现有带两条墓道的大墓;在小屯村南的花园庄村东发现铸有“亚长”族徽铭文的54号贵族墓;在小屯东南边的后冈墓葬群中,其最高身份者也应是王室贵族。

第三,宫殿区既有宫室又有墓葬的这种布局也影响了殷墟其他地方的贵族和族众,所以,我们看到,在殷墟凡是有墓葬集聚的地方,每每即有居址发现,有的还是居址,墓葬和手工业作坊集于一个遗址之中,从而形成了殷墟各个族的族居与族葬密不可分的特点,亦即除部分单独的“族墓地”外,殷墟的族居族葬每每是墓地就居地而形成的族居族葬。可以说除了王陵因在国人中有其特殊的政治,

和祭祀的王陵区,是因为王陵区属于当时都城内唯一的最重要的集聚臣民参与国家祀典的公共场所。这种公共场所的设立,无疑是在灌输和强化王权意识,炫耀国力国威,它是凝聚诸侯和臣民向心力的重要手段⁴²。尚需补充的是,商代的王与王室的其他成员,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他们在国家中的作用与地位是有本质差别的。无论是在甲骨文中,还是在文献中,商王都有“余一人”的称呼,卜辞“癸丑卜,王曰贞,翌甲寅乞西_西自上甲衣至于后,余一人亡祸?兹一品祀。在九月。……”(《英藏》1923),说其祸被认为是集于余一人即王之身上的,这正说明殷王统治的世界是由王一人来体现的⁴³。王活着的时候,既是世俗王权的执掌者,也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王死成为神灵,他既是商的王室王族的祖先神,也是整个商族的祖先神,还是整个王国的帝之外的最高神⁴⁴,而且在卜辞中,是看不到对帝举行祭祀的,从接受祭祀的角度来讲,殷人所祀的最高神就是死后的商王。由于殷王所统治的世界是由王一人来体现的,对先王的祭祀也就绝非仅仅是商的王室的事情,而是整个王国的大事,这样,王陵当然就会成为集聚臣民参与国家祀典的公共场所,从而在王陵使用大量的人牲举行祭祀时,也绝不能看成这是所谓专制君主的残暴所致,而是一种宗教需求所驱使,在当时人看来,通过大规模地祭祀,使先王的神力得到加强,使祖神的需求得到满足,这对整个王国都是一种福音,所以,将死去的王集中埋在一处——我们今天称之为王陵区的地方,并经常举行国家级别的,由众多族氏乃至四方侯伯参加的祭典,这是当时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所使然。而王室的其他成员因不具备像王那样的特殊作用,故按照当时族居族葬的习俗,可以埋葬在宫殿区内或其附近。

二, 安阳殷都的族氏结构

安阳殷都的居住特点既然是“大杂居小族居”,那么在“小族居”中,其族氏结构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左传》定公四年在说到周初分封时,曾分给鲁公伯禽“殷民六族”,并“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有许多学者将这里的“宗氏”和“分族”理解为宗族与家族两级族组织,并认为殷人的族氏结构就是由若干个血亲家族组成宗族这样一种结构。

1979年,殷墟西区发掘获得939座墓葬资料(图11,图12,图13),发掘报告的撰写者通过对墓地的分区与分群,提出殷墟西区的八个墓区“属于宗氏一级组织,而每个墓区中的各个墓群可能是属于分族的”,也就是说殷墟西区墓地中的“墓区”与“墓群”的关系即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说的殷遗民中“宗氏”与“分族”的关系⁴⁵。其后,葛英会先生撰文,对包括殷墟西区在内,含有大司空村南地,后岗南地的墓葬都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分区与分组的划分,认为“各区,各组群所代表的是不同族团,区与组的划分似应反映着族团的不同等级”⁴⁶。朱凤瀚先生则认为将殷墟西区划分为墓区与墓群这种二级亲族组织的划分过于简单,而提出墓区三级亲属组织即“大群”,“群”(宗族),“组”(主干或直系家族)的划分⁴⁷。其他,诸如唐际根⁴⁸,韩建业⁴⁹诸位,也根据墓地内墓葬之间的疏密程度和随葬器物的组合情况,或者是对殷墟西区各区墓地或者是对八区中的某一区墓地,也作过具体的分群或分组的划分。现在的问题是,第一,虽然每一位划分者在进行划分时都考虑了墓葬分布相互间的距离远近疏密和葬俗特征,但诸位所划分出的组群都由哪些墓组成,却互有差异,难以取得一致。第二,对于所划分出的墓区,墓群,墓组与族组织级别层次如何对应,亦是诸说互有不同。

尽管上述每位论者对于墓群与墓组之间究竟应对应什么样的亲族组织,确实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级别的划分,但大多数论者想说明的还是由若干个同宗的家族构成某一宗族的问题。然而,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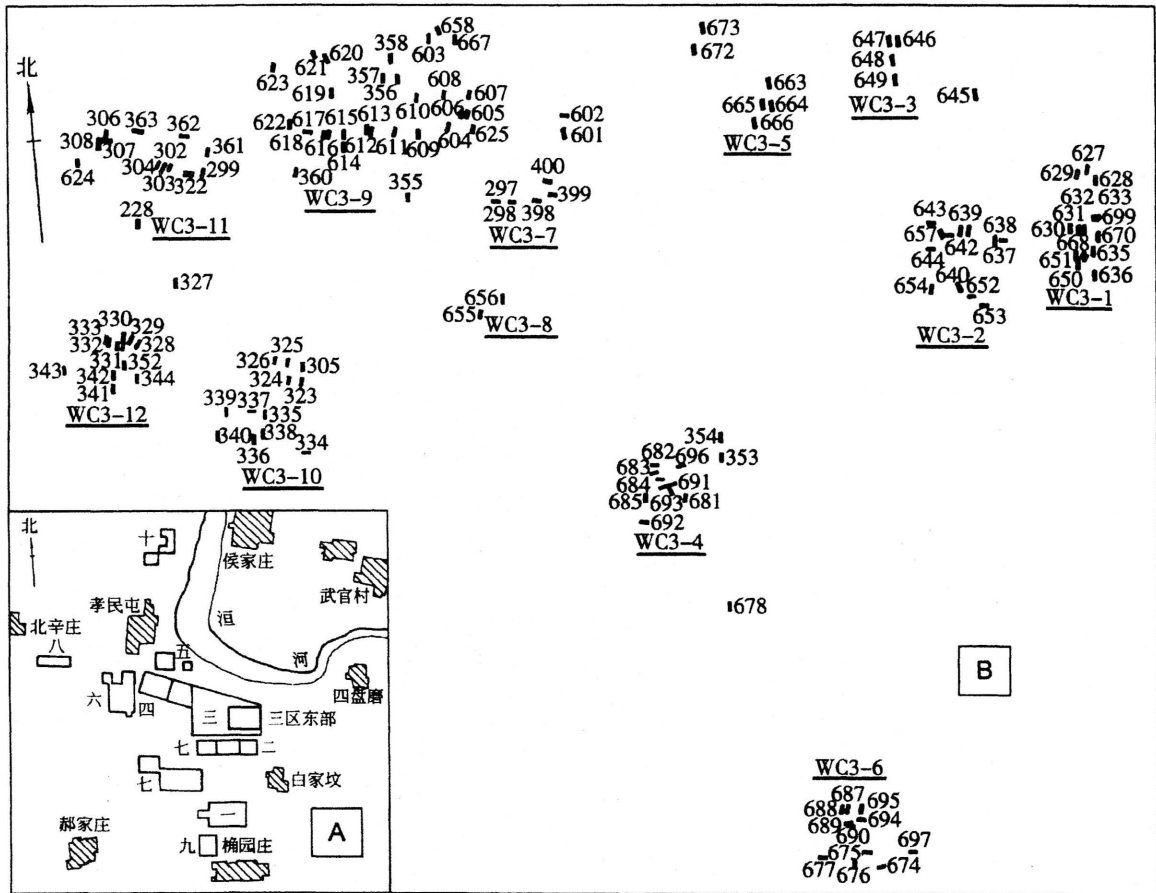


图11 殷墟西区墓地三区东部墓葬分组示意图

- A. 殷墟西区墓地分区图 一至十. 墓区编号
- B. 三区东部墓葬分组图 WC3-1~12. 分组编号

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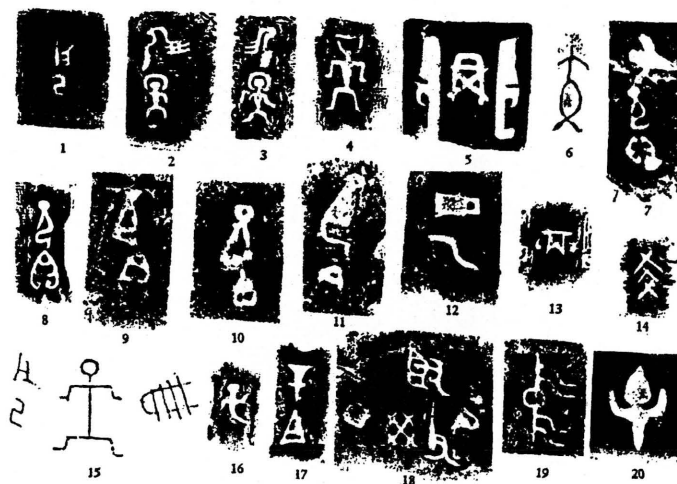


图12 殷墟西区墓地第三墓区族徽铭文拓片

- 1. 卣(198:6) 2. 觚(198:3) 3,4,8,13,14, 16, 17. 爵(198:4,692:10, 613:15,697:8, 354:2, 856:2, 793:10) 5, 20. 戈(692:14, 727:2) 6. 矛(374:7) 7, 11. 瓶(613:4, 355:5) 9. 鼎(355:7)10,12. 斝(355:6, 764:4)15. 觚(856:1) 18. 罍(793:9) 19. 斝三件(6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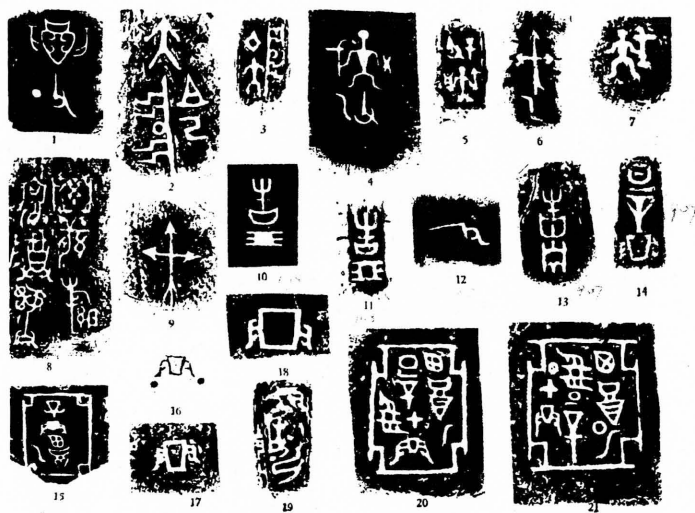


图13 殷墟西区墓地族徽铭文

- 第六墓区：1. 鬲(1102:1) 2. 觚(1080:8) 3. 爵(1080:6)
 第八墓区：4. 鼎(284:1) 5、6. 爵(1125:2, 271:9) 7. 觚(271:8)
 第四墓区：8、9. 觚(216:1, 1116:1) 10. 鼎(1118:1) 11. 爵(1118:3)
 第七墓区：12. 鼎(907:3) 13. 觚(907:1) 14、19. 爵(907:2, 152:1) 15. 铜片(907:15) 16. 铸(907:5)
 17. 卣(907:13) 18. 提梁罐(152:2) 20、21. 大尊(93:1, 4)

若将墓区的分群，分组与出土的族徽铭文对照起来看，很难得出同一墓区或某一“大群”即为同一宗氏（宗族）的结论，而同一宗族之人却可以葬在不同的居址不同的墓地之中。例如，殷墟西区第三墓区（图11）出土的族徽铭文达15种之多（图12），其中位于东南角的一组11座墓（M674，675，676，677，687，688，689，690，694，695，697）中的M697出土了一件带有“丙”这样的族徽铭文的铜器（图12：13）。然而考察“丙”这一族徽铭文，我们说出土这一族氏徽记铭文最多的是在山西灵石旌介的商墓。山西灵石旌介商墓的出土物中，在铸有族氏徽记铭文的42件铜器中，“丙”形徽铭竟有34件⁵⁰，所以“丙”这一国族的本家即宗族在山西灵石旌介，而居住在殷墟，死后葬于殷墟西区墓地者则是丙国在商王朝为官者及其家族。换言之，我们很难说M697出土的“丙”这个徽铭与该墓区出土的其他14个族徽铭文属于同一个宗族，也就是说，我们仅仅可以将位于第三墓区东南角的M674—M697这十一座墓看成是族徽铭文为“丙”的一个家族墓地，但这一家族与同一墓区（第三墓区）乃至邻近的第二墓区的其他家族不属于同一宗族。

丙的本家即宗族不在殷墟，还可以从甲骨文中得到证明。甲骨刻辞中有“丙邑”（《合集》4475），即为丙国之都邑。在卜辞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王令丙”（《合集》2478），而且也有“妇丙来”（《合集》18911反）的记录。妇丙之称已表明丙族与商王朝有婚姻关系，而“妇丙来”则进一步说明，从殷都的角度讲，妇丙之丙族是外来者。至于丙国丙族在王朝为官的情形，我们在下一节再作进一步的论述。

再如，位于第三墓区西北方向的M699出土有“中”族徽铭文，而第六墓区的M1080也出土有“大中”族徽铭文，“大中”是“大”与“中”相组合的复合型徽铭，这种复合型徽铭，有的反映了家族与宗族之间的衍生，分支之类的关系⁵¹，有的反映的可能是短暂的联合关系⁵²，但这里一个位于第三墓区，另一个位于第六墓区，第三墓区与第六墓区之间还相隔第四墓区，如果说“中”与“大中”属于同一个宗族的两个家族的话，那么它们是被分隔在两个墓区的。

还有，第四墓区 M1116 出土有“束”族徽铭文，第八墓区 M271 也出土有“束乙”族徽铭文，这也是同一宗族的两个家族被分隔在不同的墓区中。同样是“告宁”族徽铭文，在第四墓区的 M1118 出土有两例，在第七墓区的 M907 出土有一例。位于第七墓区南区西部的 M907 墓葬除出土“告宁”外，又出土有“共”，“曰辛共”和“亚共”；而位于第七墓区北区的 M93 墓葬也出土有“共”和“亚共”，第七墓区的南北两区相距 100 余米。

与“宁”相关联的族徽铭文，除殷墟西区外，殷墟南区的刘家庄北的 M2 墓葬出土有“宁”字族徽铭文的觚 1 件，有“宁父乙”族徽铭文的爵 1 件，刘家庄北 M1 墓葬出土有“宁”字族徽铭文的觚 1 件⁵³；在殷墟西南方向的戚家庄东 M63 墓葬出土有带有“宁箠”的铜簋 1 件，铜罍 1 件，铜觚 2 件，铜爵 2 件，铜卣 1 件，达 7 件之多⁵⁴。这里，“箠”原本是官名，因为在甲骨文中即有“多箠”和“左多箠”，研究者将之列入商代的武官之一种⁵⁵。“宁箠”族徽铭文的出现，是由于“宁”族中某一家族长期担任“箠”的官职，因“以官为氏”，故署名为“宁箠”，“宁箠”即成为这一家族的徽铭，但它与单书为“宁”者属于同一宗族是没有问题的。而殷墟南区的刘家庄与殷墟西南区的戚家庄相距有 2.5 公里，与殷墟西区的第四墓区相距有 3 公里，这也属于同一宗族的不同家族可以族居族葬在殷墟的不同的地方的又一事例。

位于殷墟刘家庄南的 M63 出土有 2 件“息”铭铜器，而息族铜器集中发现的地方是河南罗山县蟒张乡天湖村的晚商墓地。在前后三次发掘的 20 座晚商墓葬中，出土有铜器铭文的铜器共 40 件，其中有“息”字铭文的共 26 件，占全部有铭文铜器的 65%。出“息”铭文铜器墓有 9 座，占全部商代墓的 41%，特别是 10 座中型墓中有 8 座出土“息”铭铜器，占 80%⁵⁶。学者多认为罗山县天湖墓地为息族墓地⁵⁷，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在甲骨刻辞中有“妇息”（《合集》2354 白），也有“息伯”（《合集》20086）。息族有伯称，属于当时畿外侯伯之国；息妇的存在，表明息与商王朝存在婚姻关系，而刘家庄南 M63 出土的“息”铜器表明，息族人有人在商王都为官者⁵⁸，所以，息族的本家在罗山天湖一带，在殷都充其量只是其一个家族而已。

此外，作为“韦”（韦）族中的族徽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小屯村北 M17 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觚上铸有“韦”徽记铭文⁵⁹；殷墟西区墓地第一墓区 M2508 墓葬出土的一件铜鼎，一件爵和一件铜觚上，都铸有“子韦”徽记铭文⁶⁰；在梅园庄南地 M92 墓葬出土的青铜觚上，铸有“册韦”徽记铭文⁶¹；在苗圃北地 M54 墓葬出土的青铜觚上，铸有“弓韦”徽记铭文⁶²。在这些徽铭中，“子韦”表明殷墟西区墓地第一墓区附近有作为韦族宗子的墓葬，“册韦”表明梅园庄南地有被任命为“册”即“作册”之职官的韦族家族，“弓韦”表明在苗圃北地有以管理弓箭为官职的韦族家族。这些都属于韦宗族中在朝廷任官者，他们为官于朝，自然也就居住在殷墟，但这也说明虽为同一宗族，并都在朝廷为官，却可以埋葬或居住在殷墟的不同地方。

有了上述的例证和分析，那么，我们对于前面曾举出的诸如苗圃北地遗址出土有“亚鬲”，“宁趾”，“鬲”等徽铭；大司空村遗址出土有“洋”，“古”，“见”等徽铭；郭庄村北遗址出土有“羊”，“单”，“光”等徽铭；刘家庄村南遗址出土有“息”，“史”，“夕”徽铭；郭家庄遗址出土有“亚址”，“亚胡址”，“中”，“𠄎”，“兄册”，“作册兄”，“乡宁”等徽铭；戚家庄村东遗址出土有“爰”，“宁箠”，“钺箠”等族徽铭文，就可以作出进一步的推论，即首先它们反映出每一地都是由多个族氏所族居；其次，对于每一地的这些族氏所构成的关系，目前显然无法确定它们一定就是“宗氏”与“分族”的这种结构关系，从而也就不能排除有些遗址中的诸族氏虽聚为一地，相互之间实属不同的宗族。

这样，尽管由《左传》定公四年等文献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商代应该存在“宗氏”与“分族”这

样的二级亲族组织结构；也尽管由殷墟各处墓地材料中诸墓葬的空间分布与排列组合，我们可以划分出墓群与墓组，而且这种同一片墓地中的墓群与墓组的组合中也不排除其中有的可能是“宗氏”与“分族”这样的二级亲族组织结构，但上述诸多例子也说明，在殷都中，同一宗族的诸家族是可以族居族葬在殷墟的不同的地方的，它反映出殷都的许多贵族和族尹有可能仅仅是以家族的形式聚族而居的。为此，笔者认为，在理论上商代存在着“宗氏”与“分族”这样的宗族组织结构，但在晚商的殷都，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既不排除有以宗族的形式进行族居族葬者，也大量存在着仅仅以家族的形式进行族居族葬者，这说明晚商王都族居族葬的基本单元是家族而非家族之上的宗族，换言之，在晚商王都，商的王族和一些强宗大族虽有可能是以宗族与家族相结合的结构而组织起来的，但王都内其他不同族属的族人们最初每每都是以家族的形式出现的这一现象，以及晚商王都族居的特点主要是以家族为单元而呈现出的大杂居小族居，它反映出王都内的地缘性即亲族组织的政治性要较其他地方发达一些，这说明商代亲族组织的血缘关系也是要为王权服务的，王都的这种族居特点，与商代的都鄙结构一样，都是与商王的统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三、与殷都族氏结构相关联的王权

商的王权及其统治方式与商代的国家结构及殷都的族氏结构都是有关系的。笔者曾提出商的国家结构是一种“复合型国家结构”⁶³，在这种“复合型”国家中，商王作为“天下共主”，他既直接统治着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侯伯之国，这些众多的侯伯之国也被称为“庶邦”。由于商王的“天下共主”的地位，王邦即王畿地区对于其他众邦其他庶邦来说是“国上之国”；而所谓庶邦，有许多是在夏代时即已存在的一个个邦国，到商代时它们并没有转换为商王朝的地方一级权力机构，这些邦国臣服或服属于商王朝，只是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因而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所以，在商王朝在的结构中，它是由王邦与众多庶邦组成的，是复合型的，就像数学中的复合函数一样，函数里面套函数。由于在以王为天下共主的王朝中，那些主权半独立的一个个邦国之君，在其国内都行使着国家君主的权力，各邦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作为天下共主的商王对于各地的庶邦也只能施行间接的统治或支配。而对于王畿特别是王都范围内，商王则可以施行直接的统治与支配。这种间接支配与直接支配相结合的统治方式，是复合型国家结构中王权的一大特点，而王权对王都范围内的直接支配则直接影响着王都内的族氏结构。

对于王畿外的侯伯，商王通过让他们担任朝中要职而使之成为朝臣，在卜辞中则称之为“多君”，如《史记·殷本纪》说商纣以西伯昌，九侯（一作鬼侯），鄂侯为三公，就是明例⁶⁴。他们既为朝臣，有时就需要居住在殷都，而且还应该是以族居即家族的方式居住在殷都的。权力是有空间限制的，商王对于他们的邦国的支配是间接的，而对于他们本人及其住在殷都的家属的调遣与支配，则是直接的。

再如卜辞中的“小臣醜”（《甲骨文合集》36419）与山东青州苏埠屯出土的徽铭“亚醜”，也属于畿外侯伯或服属国族在王朝为官者。山东青州苏埠屯一号大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墓室面积达56平方米，殉犬6条，殉人多达48人的规模极大的墓葬（图14，图15）⁶⁵。苏埠屯遗址虽然尚未发现城址，但是这种带有四条墓道的大墓的规格与殷墟王陵是一样的，而且由该遗址出土铸有“亚醜”族徽铭文的大铜钺以及五六十件传世铜器中都有“亚醜”（图16）⁶⁶。铭记来看，亚醜最初可能是商王派到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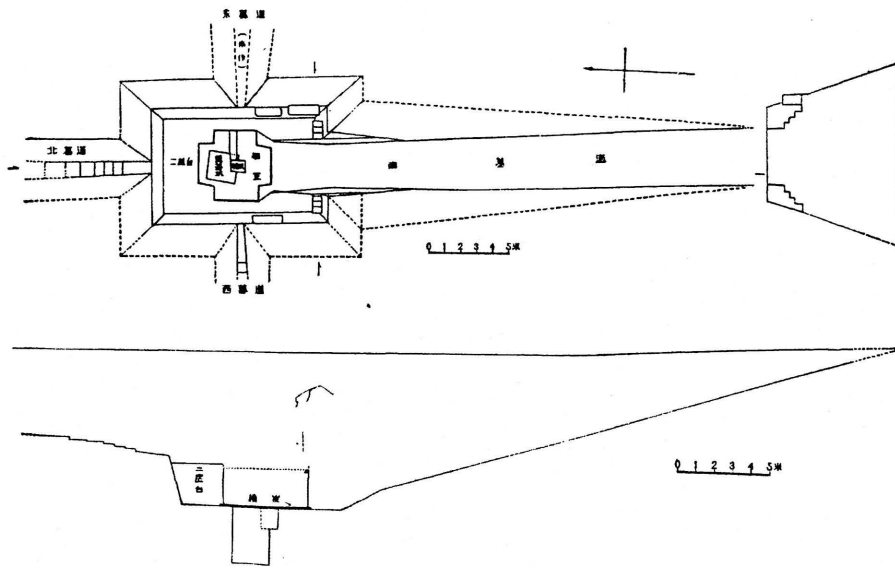


图14 山东青州苏埠屯一号大墓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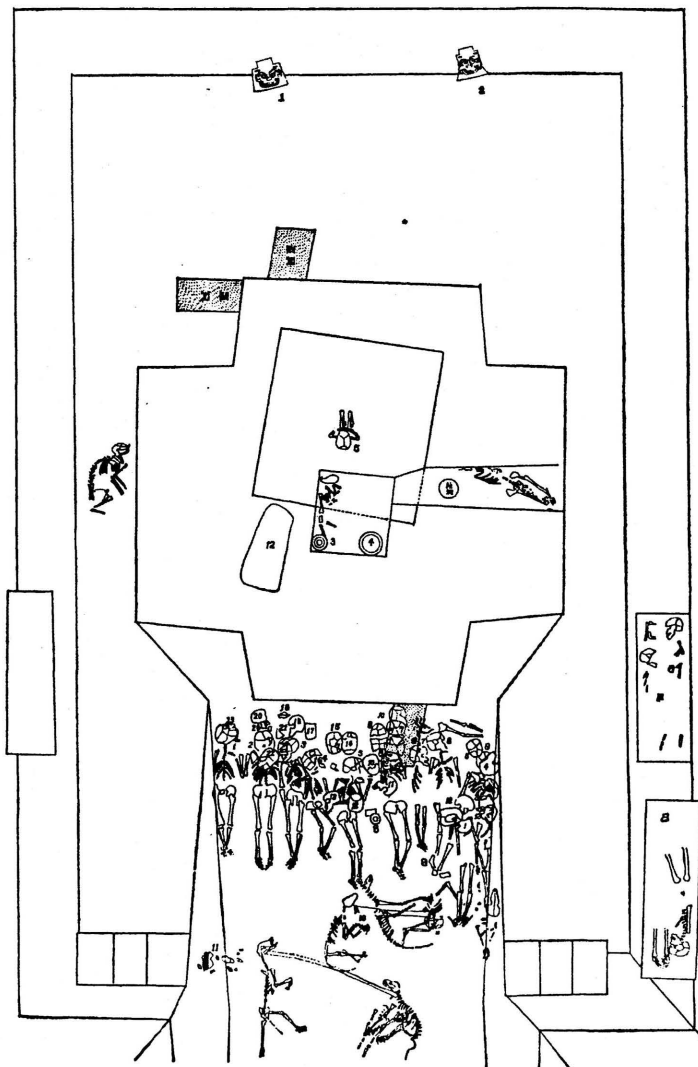


图15 山东青州苏埠屯一号大墓殉人及遗物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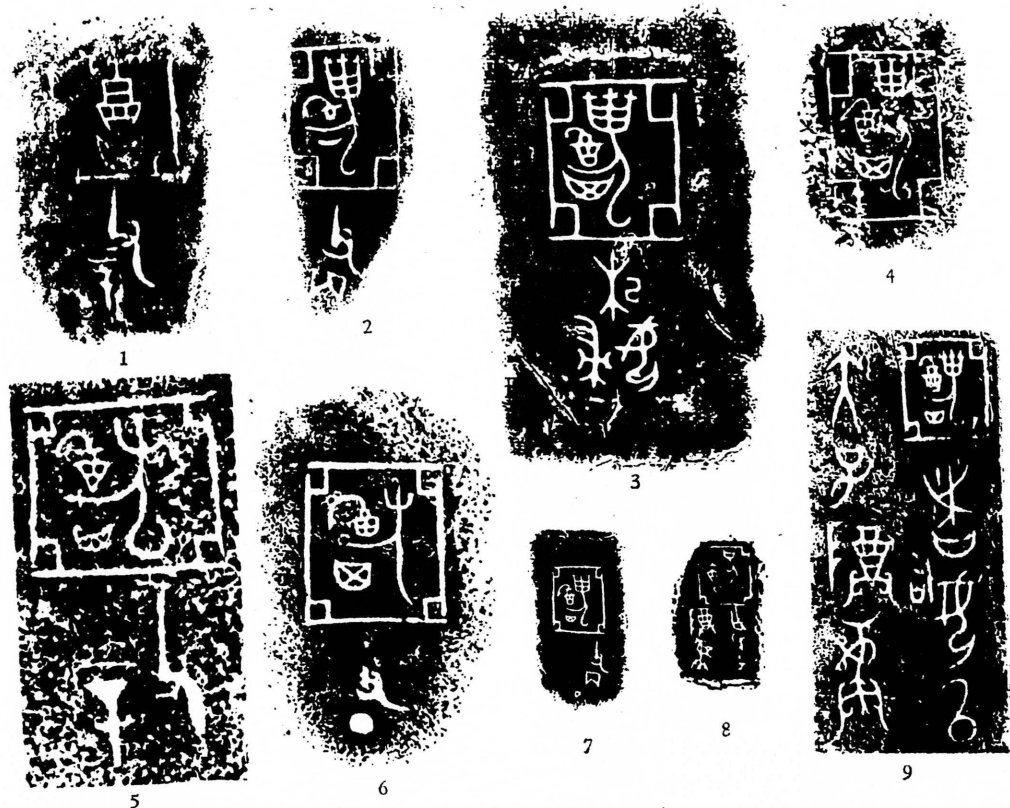


图16 传世铜器中的“亚醜”族徽铭文

- | | |
|----------------------|---------------------|
| 1. 亚醜父辛鼎铭 《三代》二·二八 | 6. 亚醜父丁方盃铭 《三代》十四·四 |
| 2. 亚醜父丙爵盖铭 《三代》十八·二十 | 7. 亚醜父丙方鼎铭 《拾遗》图二 |
| 3. 亚醜杞妇卣盖铭 《三代》十二·六十 | 8. 亚醜季尊铭 《三代》十一·二十 |
| 4. 亚醜方鼎铭 《三代》二·九 | 9. 亚醜者女方觥 《三代》十七·二六 |
| 5. 亚醜父辛簋铭 《三代》六·十七 | |

土，住在苏埠屯的武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后来发展成了外在的诸侯，但同时还在王朝兼任小臣之职，称为“小臣醜”。既然在王朝任职，当然他和他的家族就需要居住在殷都，从而形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家族以“大杂居小族居”的方式混居在殷都的格局。

前面提到的丙国也是这种情况。说到丙国派遣人在王朝为官，从一些传世的丙国铜器铭文也可以得到印证。如《续殷文存》下18.2著录有一爵，“丙”下有一“亚”框，可以称之为“亚丙”，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二、三期。此“亚”即《尚书·酒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之亚，它原本是内服即王畿内之职官，“亚”形徽记之所以与“丙”形徽记组合成复合型徽记，是因为古代有以官职为徽号的情况，这就是《左传》隐公八年众仲所说的“赐姓”，“命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所以，“丙”下有“亚”框的这种带有“亚”符号的族氏徽记，就属于因官有世功而形成官族后将其族氏徽号铸在铜器上，以显示自己身世尊荣的又一例证。此外，丙族在商王朝还曾担任“作册”一职，如《丙木辛卣铭文》即写作：“丙木父辛册”⁶⁷。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录有在鼎和卣上铸有“丙”形徽铭的两篇长篇铭文⁶⁸，鼎铭（图17）记载作器者在某地受到商王赏赐贝而为父丁作器，卣铭（图18）记载作器者在虞地受到商王赏赐而为毓祖丁作器。这些都说明丙族首领接受商王职官封号，为王服务，受王赏赐。这些在朝为官的丙国丙族之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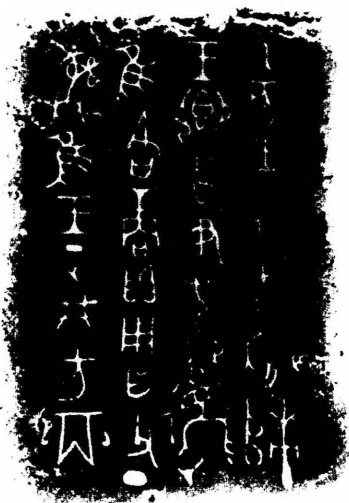


图17《三代吉金文存》4·102（鼎铭）



图18《三代吉金文存》13·386（贞铭）

貞
器

们居住在殷都，自然构成了殷都的“大杂居小族居”，而从王权的支配来看，对于远在山西灵石旌介的丙国丙族本家而言，商王对他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而对于居住在殷都任职的丙族的某一家族而言，商王对其实行的则是直接支配，或者说商王正是通过对居住在殷都任职的丙族的某些家族的直接统治，而间接支配着远在山西灵石旌介的丙国与丙族。

前述“子韦”，“册韦”，“弓韦”，“典韦”的韦族，有可能就是《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韦，位于河南省滑县。据甲骨文“戊寅卜，在韦师，人无戈异，其藉”（《合集》28064），可知韦族有自己的军队，有农田。作为韦族族长的子韦，其领地应该是由子韦自己支配和管理的，从复合型的国家结构和商的王权来讲，商王对韦族领地在理念上应具有支配权，而其实际的支配当然是通过子韦而进行的间接性支配，至于诸如“册韦”，“弓韦”，“典韦”这些在朝为官的韦族的几个家族，商王对他们的支配当然是直接的，而且由于王权的作用，他们虽为同一宗族，并都在朝廷为官，然而却埋葬或居住在殷墟的不同地方。

最近发现的殷墟花园庄54号墓是一座在朝为官的显赫贵族墓(图19)。墓内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竹器，象牙器，金箔，贝等各类器物共达570余件，其中有铜钺7件和大型卷头刀以及大量青铜戈，矛等兵器(图20,图21)，并在所出的青铜礼器上，大多有铭文“亚长”二字(图22)。“亚”为武职官名，这与墓内随葬大量青铜兵器也是相符的；“长”为甲骨文中“长”族之长。为此，发掘者认为54号墓的墓主当为“长”族的首领，是一位兵权在握的显赫贵族⁶⁹。在甲骨文中，长族邦君在一期时即被称为“长伯”（《合集》6987正），到廪辛康丁时期，出现有“长子”的称呼（《合集》27641）。卜辞中族长将领“长友角”，“长友唐”也是有名的（《合集》6057正，6063反等）。长伯的封地即称为长，商王关心长地的年成，卜问“长不其受年”（《合集》9791）。商王还经常与长族进行联络，常常卜问派遣官员“往于长”（《合集》7982，《怀特》956），也有商王亲自行至长地的记录（《合集》767反，36346，36776）。关于长在何地，根据长与方，羌（《合集》495）均有涉，以及今山西长子县西郊有春秋时期的“长子”古地名等情况，已故的林欢博士认为“长”族原居于今山西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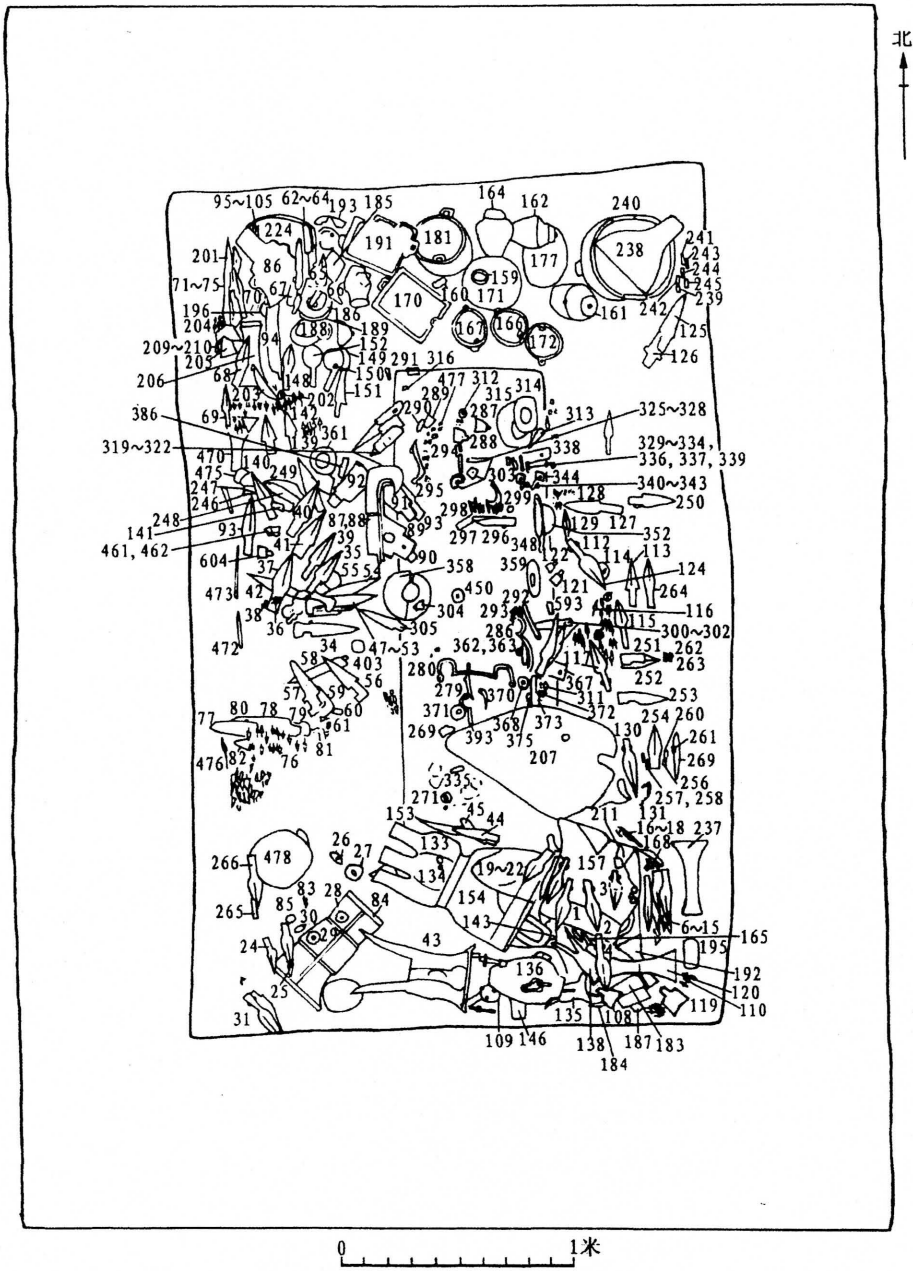


图19 殷墟54号墓出土随葬品分布图

- 1-4、6-25、31-33、35、37、39-41、44、45、62-65、67-75、95-105、111-113、115、117、129、130、137、139-141、201、254、264、266、472。矛 26-30、55、85、114、123、124、133、134、168、271、335、403。铜泡 34、42、46-54、56-59、66、77-82、90、93、125-127、239、241-253、256-258、260-263、296、297、302、305、344、473、476。戈 36、38、76、83、110、116、128、142、204、293。铍 43。方斝 60、121、122、269、287-291、304、311、461、593、604。铃 61。象牙器 84。方尊 86、89、91、92、131。钺 87、88、94。卷头刀 108、119。铍 109、135、138、153、165、184。爵 120、192、205、206、237、470。觚 136。罍 143。铲 146。觥盖 148。玉叶铜嵌牙 149、152。勺 150、312、316、329-334、336、337、339。玉管 151。刀 154。甗 157、169。盂 159、160。圆箍形玉器 161、162、164、182、185、186、188、189、193、196。陶尊 166、167、172、181。分档圆鼎 170、191。方鼎 171、177。簠 224、240。圆鼎 183。方彝 187。斗 195。觥 202。圆形骨饰 203、280、286、303、348、393。弓形器 207。石磬 209、210。石刀 211。玉器 238。陶将军盔 265。铸 279、300、301、373。兽首刀 292、294。策 295。铃首锥状器 298。骨铍 299。478。不明铜器 313。玉援铜内戈 314、315、320、358、359、367。玉戚 319、321。玉戈 322、338。玉圭 325、363。玉璋 326。玉兽头 327、368、371、450。龙形玉饰 328、372。玉纺轮 340。玉玦玕 341-343。玉兽面 352。玉璧 361。玉环 362。穿孔玉饰 370。玉夔龙 375。玉刀 386。玉柄形饰 475。牛尊 477。贝 (未注明质料者皆为铜器;被压在下层的器物图中未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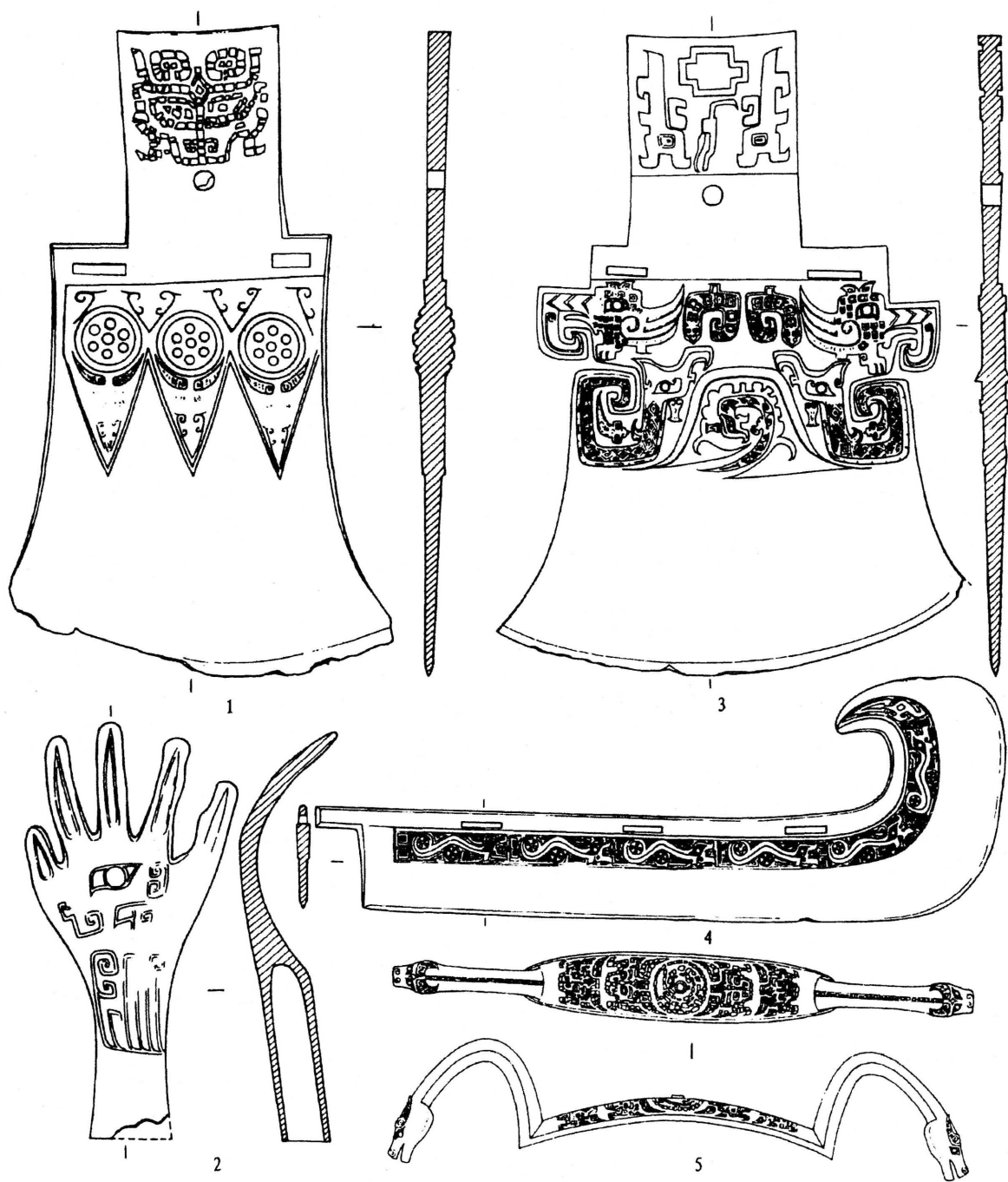


图20 殷墟54号墓部分铜器

1. Ⅲ式钺 (M54: 92) 2. 手形器 (M54: 392) 3. I式钺 (M54: 86) 4. 卷头刀 (M54: 87) 5. 弓形器 (M54: 286) (1,2. 约 2/5, 余约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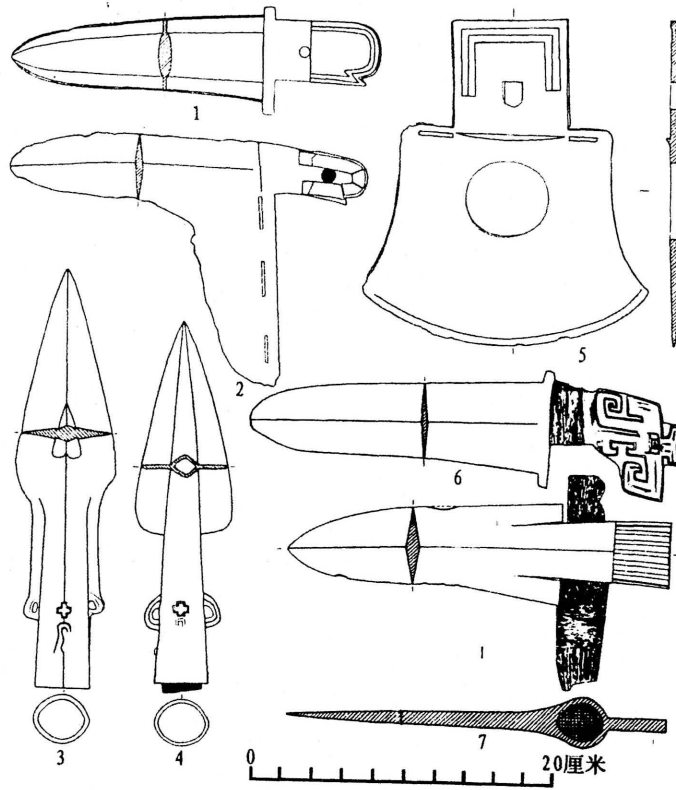


图21 殷墟54号墓铜兵器

1. A型Ⅰ式戈 (M54: 223) 2. A型Ⅱ式戈 (M54: 197) 3. B型矛 (M54: 37) 4. A型矛 (M54: 113) 5. Ⅱ式钺 (M54: 89) 6. B型戈 (M54: 47) 7. C型戈 (M54: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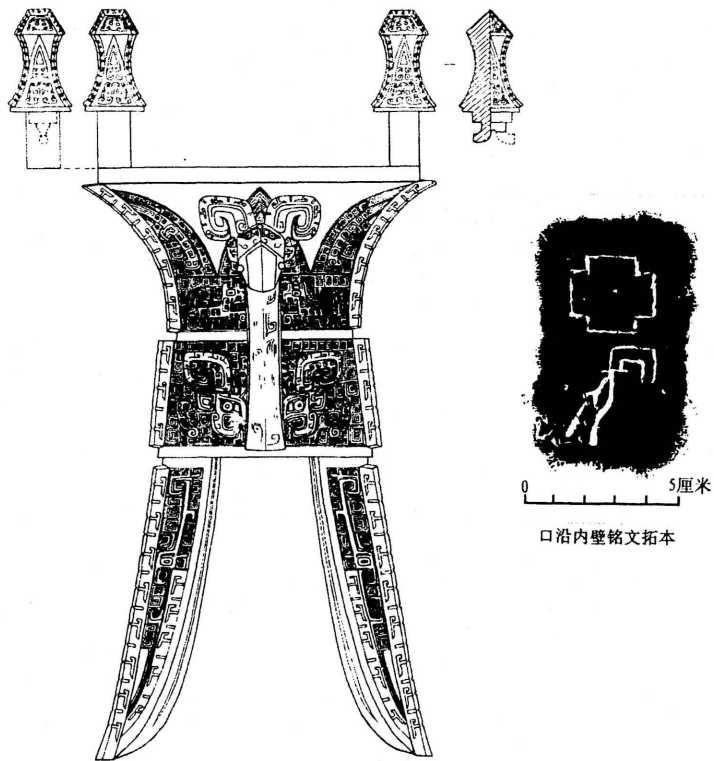


图22 殷墟54号墓出土铜方罍及其“亚长”铭文。

县，河南鹿邑县太清宫的长子口墓墓主人是商亡国之后南迁的“长子”族首领⁷⁰。那么，花园庄54号墓墓主当为商王祖庚祖甲时期长族派遭到殷都并居于殷都，在朝为武官的大贵族。

还有，在今安阳梅园庄村一带，东北距小屯宫殿区约2公里，是一处集居地与墓地于一体的居址，出土有被称为“光”等家族的徽铭，而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光”也被称为“侯光”，属于侯伯之类的诸侯，如“丙寅卜，王贞：侯光若……往~~光~~嘉……侯光……”（《合集》20057）。“侯光”他作为诸侯的领地当不在殷墟梅园庄，因为梅园庄一带出土的徽铭不止“光”一个族，还有“单”，“册韦”，“天鬲”等族，梅园庄出土的“光”徽铭，只是光侯中的一个家族而已，也就是光侯国族中在朝廷为官者。在卜辞中，商王要求“光”致送“羌芻”：“甲辰卜，亘贞：今三月光呼来？王占曰：其呼来。迄至惟乙，旬又二日乙卯，允有来自光，以羌芻五十。”（《合集》94正）也有卜问“光”能否获羌：“贞：光获羌？”（《合集》182）“光不其获羌？”（《合集》184，185）“……光来羌”（《合集》245正）。这说明商王既直接统治着光侯国族中在朝廷为官的家族，也通过住在殷墟的光的家族间接支配着光侯这样的国族，要求他们致送“羌芻”。

总之，商王对王畿以外侯伯国族即庶邦的间接支配与他对王都内同姓和异姓众家族或宗族的直接支配的这两种方式，恰与《尚书·酒诰》所说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是完全一致的，而《酒诰》的记载恰可以与《大盂鼎》“惟殷边侯田粤殷正百辟”铭文对应起来，现在我们将这些与殷都的族居特点与王权的支配方式相联系，更能说明《酒诰》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也是可信的。《酒诰》内，外服的区别也就是王畿与甲骨文中所谓“四土”的区别。王畿之中，虽说似乎也有被称为侯的领地，类似于周代的畿内诸侯，但王畿即内服的主要特征是在朝为官的朝臣，其居邑亦可称之为王族和执掌各种职官的贵族大臣的族邑。从王权的视角及其权力的空间范围而论，商王的支配力之所以能达到家族宗族这一层面，是因为这些家族宗族的居址分布于王都所直接统辖的范围的缘故；而众多家族特别是异姓家族之所以能散居于殷都之中，又在于他们是在朝为官的朝臣。正是因为这些缘故，才造成王都内小族居与大杂居相统一，使得晚商王都内的地缘性即亲族组织的政治性要较其他地方发达许多。

¹ 王震中：《“中商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²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5期。

³ a· 唐际根、徐广德：《洹北花园庄遗址与盘庚迁殷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4日。

b· 杨锡璋、徐广德、高炜：《盘庚迁殷地点蠡测》，《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c· 岳洪彬、何毓灵：《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知》，《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d· 王震中：《“中商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⁴ 岳洪彬、何毓灵：《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⁵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59年，台北。

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河南安阳殷墟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5期。

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小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7月。

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 ⁹ 岳洪彬2005年1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4年度田野发掘成果汇报会”的报告。
- ¹⁰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第329～330页。
- ¹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 ¹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21页。
- ¹³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 ¹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33页。
- ¹⁵ 岳洪彬2005年1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4年度田野发掘成果汇报会”的报告岳及2005年1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报告。又见岳洪彬、何毓灵：《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5日。
- ¹⁶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 ¹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这项发掘的队长为王学荣先生。另参见岳洪彬、何毓灵：《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5日。
- ¹⁸ 由于家族内口粮、日用品的需求，这些家族或宗族在从事某种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的同时，每每也兼营农业、渔猎、纺织等生产，所以，在有些手工业作坊遗址中也出土农业、渔业和纺织等生产工具。
- ¹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16～12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46页；《殷墟考古又有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31日。
- ²⁰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 ²¹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19页。
- ²²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页。
- ²³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4页。
- ²⁴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博物馆：《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
- ²⁵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²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月。
- ²⁷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徐家村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²⁸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66～77页。
- ³⁰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 ³⁰ 发掘者将此字释为“享”。这里从严志斌博士释为“息”，参见严志斌博士学位论文《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
- ³¹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³² “举”字较复杂，最初孙让将其隶定为“析子孙”，罗振玉从此说，也有人将其隶定为“冀”，于省吾先生将其隶定为“举”，这里从于说。
- ³³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
- ³⁴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67页。
- ³⁵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9页。
- ³⁶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9页。
- ³⁷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³⁸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家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 ³⁹ 参见岳洪彬2006年1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5年田野工作汇报会”上的报告。
- ⁴⁰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第86页，图二。
- ⁴¹ 在殷墟宫殿区的范围内，甲、乙、丙三组基址的一些基址以及1989年发掘的位于乙组基址南约80米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应该较早；诸如小屯村西即今考古所安阳工作站一带的大型夯土建筑应该是宫殿区在向西扩展的过程中，逐渐扩展出来的。

- ⁴²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 ⁴³ 伊藤道治：《王权与祭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⁴⁴ 学术界一般多认为卜辞中的“帝”是商代的最高神或至上神，笔者认为卜辞中的帝比较特殊，说它是殷人的至上神，有些特征又不太完整，它处于正在走向至上神的发展途中。参见王震中《帝誉并非商之始祖》，《殷都学刊》2004年第3期。
- ⁴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 ⁴⁶ 葛英会：《殷墟墓地的区与组》，《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7年。
- ⁴⁷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5～123页。
- ⁴⁸ 唐际根：《殷墟家族墓地初探》，《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⁴⁹ 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第1期。
- ⁵⁰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年第7期。
- ⁵¹ 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 ⁵² 严治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142、15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
- ⁵³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第1～21页。
- ⁵⁴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第1～21页。
- ⁵⁵ 陈梦家：《殷墟卜辞研究》，第511页。
- ⁵⁶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 ⁵⁷ 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 ⁵⁸ 严治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第169页。
- ⁵⁹ 发掘者将此铭文释为“卫”，见《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第511页。应释为“韦”，参见杨树达《韋父丁鼎跋》，《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页；周永珍：《殷代“韦”字铭文铜器》，《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⁶⁰ 参见《殷墟青铜器》六四、六五、六六诸器说明辞，第449～450页。
- ⁶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2期。
- ⁶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
- ⁶³ 王震中：《商代的王畿与四土》，《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
- ⁶⁴ 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⁶⁵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⁶⁶ 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 ⁶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第84页，5166，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10月出版。
- ⁶⁸ 分别见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4·10·2和13·38·6，中华书局，1983年版。
- ⁶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 ⁷⁰ 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关于长子口墓，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周初封于宋地的微子启的墓葬，参见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松丸道雄《河南鹿邑県長子口墓をめぐる——古文獻ととの2004年11月。

商代における殷都の族居特点と商の王権

王震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

(翻訳：宇野隆夫)

商王朝の歴史の中で、一般に盤庚遷殷（盤庚の殷遷都）から商紂王の滅亡に至る 273 年の間を商代晩期と呼んでいる¹。晩商の王都は河南省安陽の殷地にあったため、「殷都」と称されている。従来の研究の所説による殷都は、一般に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殷墟宮殿区を中心的王都としてきたが（図 1）、近年になって洹北商城が発見され（図 2, 図 3）²、学者達は、所謂「盤庚遷殷」で遷った都城は河南省安陽市の洹北商城であり³、洹河の南岸に位置する小屯村の宮殿区は則ち武丁以来の殷都の中心区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た（図 1）。洹北商城は近年来の重大な考古学発見であるが、その発掘はまだ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あるのに対して、小屯宮殿区は重点的考古学発掘の八十年の歴史がある。八十年の間に、安陽殷墟考古発掘で獲得された成果には、宮殿宗廟と王陵およびその中にある大量の住居建築遺址を含み、墓葬、手工業工房遺跡や墓から出土した青銅器の上に鑄出した各級の徽銘文、これと関連相関する甲骨卜辞などは、我々が晩商王都の族居の特点（特色）、その族氏の構造およびそれと商王権の関係を分析するための、多方面の具体的かつ豊富な材料を提供しているため、ここで論述する「商代における殷都の族居特点と商の王権」では、主に安陽小屯宮殿区における商王武丁から商紂までの時期の状況について論じることとする。

1 安陽殷都の「大雑居と小族居」の特徴

殷墟の晩商王都と称される地区にあっては、八十年の考古発掘が経過して、我々は殷墟の範囲が総面積 36 平方キロメートルに達し⁴、宮殿区と王陵区外を除くと、その多くが四方八方に散布する族衆の居住地や手工業工房遺跡などの遺跡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これらの族衆の居住地と手工業工房遺跡は「大雑居と小族居」（大きな角度から見ると雑居、小さな角度から見ると族居）の特色を呈している。所謂「大雑居」は殷墟の範囲で多くの異姓の族人が入り交じって住むことを許して、一種の雑居的状态を呈するものを言い；所謂「小族居」は比較的小さな範囲内に「家族」あるいは「宗族」の構成で族居・族葬するものである。

殷墟の宮殿宗廟区は洹水南岸の小屯村一帯に位置し（図 1）、20 世紀の 30 年代の発掘で甲組、乙組、丙組 53 基の宮殿宗廟基壇の建築基址が出土し⁵、1981 年には乙二十基址の南 80 メートル余りの場所で一ヶ所の大型版築建築基壇址が新たに発見されたが⁶、但し殷墟の宮殿宗廟区の分布はまだ偃師商城の宮殿区ほどには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ない（図 5, 図 6, 図 7）。殷墟の宮殿区内の遺跡に在るものは、宮殿宗廟の類だけではなく、20 世紀 70 年代末から 80 年代中頃まで、考古学者が小屯西北の地にあって、丙組基壇址から西約 130 メートルの距離の地点で、大量の小型住居、窖穴（貯蔵穴）、墓葬を含む 50 余所の基址を発掘し、著名な婦好墓では「子漁」の銘文、

18号墓では「𠄎侯」(征侯)など五種の銘文、17号墓では「韋」の銘文が、発見された。この一帯には1基の地下式住居と1基の半地下式住居内から、玉、石彫刻品、石材と磨石などの遺物の出土があり、ここに一つの制玉手工業工房があったことを示し⁷；最近甲五基の西北の近くでも一基の玉材坑の発見があって⁸、宮殿区の中心部分にも制玉手工業工房が存在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このほか、20世紀30年代、宮殿宗廟区乙組基址の乙五址の下の灰坑の中から銅器を鑄造する陶範(陶製鑄型)2506点が出土し、甲組の甲一、甲二基址の下からも陶範の出土があり、甲七では、甲十基址の下に大量の銅鍊滓(青銅スラグ)があり⁹、これらは乙五宗廟宮殿建築の前にある宮殿宗廟区乙五基址の所在地に、一つの鑄銅手工業工房があったことを表している。さらに、2000年12月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は小屯村南の花園庄村東のボーリング調査で、商代の版築基址と多数の灰坑および10余基の商代墓葬を発掘し、その中で54号の番号をつけた有力な貴族墓葬を発掘したが、その墓の中からは青銅器など各級の随葬品570余件と、多くの「亞長」族徽銘文を鑄出した青銅礼器が出土した¹⁰。これらは所謂宮殿宗廟区には王室成員墓(婦好墓など)、貴族墓(M54, M18, M17等)、一般の「王衆」の小墓、および王室が直接に統制する玉器制作や、銅器の手工業工房、糧食などの物資を貯蔵する窖穴と普通の住居址などがあったことを表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宮殿宗廟区には宮殿宗廟が集中し、また王室が所在するこの地区では王族の生活と生産状況が表れていて、それは王族族居の一つの場所を形成していた。

王陵区は洹水の北岸武官村北に位置し(図8)、13基が王陵に属する墓道をもつ大墓であり、付近には1500基の密集しかつ整った配列の祭祀坑と若干の大墓傍らの陪葬墓がある。王陵区内の膨大な数量の祭祀坑は長期間にわたり頻繁に使用して形成されたものであり¹¹、王陵区が商王の陵地であるとともに、当時の商王室の祖先祭祀という公共祭祀場所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この種の比較的単純な宗教的意味が、その精神性を顕示している。

宮殿区と王陵区の外でも、殷都の「大雑居小族居」、すなわち多くの族衆の居址と、墓地と手工業工房の分布が、分散性と族居性が結合する特色を表している。

まず殷墟の手工業工房の例では、この類の遺跡は数量的には発見が最も多いが、但し我々はある場所を手工業工房区として把握することは難しく、その原因は即ち；一つにはそれらの分布が非常に分散して、殷墟の東西南北の四方のすべてにあることにある(図9)。例えば、苗圃北地の鑄銅工房遺跡は小屯村の南約1キロメートルに位置し；薛家庄鑄銅・制骨(骨器制作)工房遺跡は苗圃北地の東北に位置し；孝民屯鑄銅工房遺址は小屯村西北約2.5キロメートルに位置し；北辛庄南地の制骨工房は殷墟西北に位置し；大司空村東南の制骨工房は、洹河の東岸に位置している、などである。二つにはこれらはそれぞれが、比較的小さな族居形態と関係しつつ併存したことである。例えば、苗圃北地の鑄銅工房一帯では「亞鬲」「寧趾」「鬲」などの族徽銘文が四五種の多きに達して、ここの族居が多く家族で構成され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¹²。また、大司空村東南地では、1380平方メートルの手工業工房の範囲が発見されたが、この一帯すなわち豫北紗歴およびその付近にはまた約900基が分布する殷代墓葬の発掘があり¹³、これらは衆族を葬る一つの「族墓地」であるが、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は豫北紗歴内で、一組の貴族の宮殿宗廟版築建築址群を発掘した¹⁴。この墓地の墓葬の中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に「洋」、「古」、「何」「見」など十種以上の異なる族徽銘文がある¹⁵。大司空村東南地の制骨工房と貴族宗廟建築群、墓道をもつ大墓、数百基の墓葬「族墓地」および十種以上の異なる種類の族徽銘文を

総合的に考慮して、考えられることは、大司空村、豫北紗歴一帯の族居族葬には「洋」「古」「見」など十以上の貴族族氏の族居族葬があり、大司空村の制骨工房はここに居住するある一つの貴族族氏の手工業生産地であったことである。

上述の各類の手工業工房遺跡は、数が多く存続時間は比較的長く、例えば苗圃北地の手工業工房遺跡の年代は殷墟一期末に始まり、その後規模が不断に拡大して、殷代末年の殷墟四期まで継続した。薛家庄手工業工房遺跡も、殷墟文化第二期から三、四期まで継続する。孝民屯村発見の百基近い半地下式住居からなる平民の村落は、使用年代が殷墟二期であり；2003-2004年発見の鑄銅遺跡は主要には殷墟文化三、四期であり；整理された1177基の墓葬も、絶対多数が殷墟三、四期に属し、いくつかが殷墟一、二期である¹⁶。存続の時間が長く、また族居の形式の居住からみて、それらは明らかに世工世族（世襲の工房、氏族）である。この種の家族あるいは宗族を単位とする手工業生産形態は¹⁷、商代手工業専門生産の一般形態であり、『左傳』定公四年に記す殷遺民のなかの条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終葵氏などが、この種の情況に該当するであろう。この種の世工世族また大雑居小族居の分布からみて、各族の手工業工房が宮殿区王陵区のような一つの地区に集中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った。家族あるいは宗族がある一種の手工業をおこなったり、あるいは主要な手工業を同時におこなったり、その他の類の手工業を兼営したりした。この種の大雑居小族居は殷都手工業工房の分布の分散性を決定した。

族居の世工世族の手工業工房遺跡のほかにも、殷墟ではまたその他の族居族葬遺跡が多く発見されている。例えば小屯村西約2キロメートルの白家坟遺跡では、すでに20世紀60年代から90年代にかけて、集中した墓葬の発見があり、また多くの版築住居、数十基の窖穴、灰坑と水井が発見され、一つの建築基址の下には長さ約16メートルの陶配水管道があった¹⁸。白家坟遺跡に近接した殷墟西区第七区、第一区の墓葬について、それらと白家坟遺跡とが一つの族邑に属して、その墓葬から出土した「共」、「告寧」、「子韋」、「克」などの族氏徽号と墓道をもつ大墓、車馬葬などは殷墟の中にいくつかの重要な望族がいて¹⁹、その族には「共」、「告寧」、「子韋」、「克」などの多くの族氏貴族が含まれていた可能性を考える学者がいる。

小屯の南に位置する苗圃南地では、かつて商代の灰土層、灰坑と50余基の墓葬の分布があることが発見されていた。その中のM47、M58、M67墓葬の中から出土した「𠄎」の族徽銘文がある²⁰。この群の墓葬からはこの一種の徽銘だけが出土していることは、苗圃南地の墓地は「𠄎」族の墓地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かつM47出土の「𠄎己」を鑄出した大鼎からみて、この鼎を用いた墓主は高貴な身分をもち、それはまた「𠄎」族が当時かなり高い地位にあったことを反映している²¹。

殷墟西南の郭庄村北では、1986-1987年に殷代の墓葬167基を発掘し、9基の墓から青銅礼器が出土した。この墓地から出土した族徽銘文は七種であり、「羊」、「単」、「光」などがある²²。「羊」族徽銘文は、かつて梯家口村西の殷代墓地から発見があり²³。「羊」、「単」、「光」など多種の族徽銘文が范家庄村南からも発見されていることは、以前の著作にも記載がある²⁴。「羊」「単」「光」など多種の族徽銘文が郭庄村北から発見されたことは、この一帯が少なくともいくつかの異なる族氏の葬地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苗圃の東の郭家庄では、1982-1992年に191基の商代墓葬を発掘し、「亞址」、「亞胡址」、「亞胡止」、「中」、「𠄎」、「兄冊」、「作冊兄」、「郷寧」などの族徽銘文の出土があり²⁵、郭家庄もま

た多くの族氏の族葬の地であったとみることができる。

小屯村の南約2キロメートルの所に位置する北徐家橋村北、劉家庄村北と村の南もまた貴族族居地であり、例えば1992年、1996年、北徐家橋村北で殷代墓葬70余基を発掘し、殷代版築住居3基を発見したが、その中のF1とF2版築建築面積は30平方メートル以上であり²⁶；2001-2002年、北徐家橋村北でも一個所の規模が広大で、分布が密集し、建築形式が独特の四合院式の基址群を発見し発掘した²⁷。この一建築群の周辺でも商代建築基址の発見があり、これらが緊密な関係に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徐家橋村北のような大型の版築建築基址の規格と建築群の規模は、この一帯に居住した氏族の地位と実力がかなり高く、その族衆の人口もまた少なかつたことを表している。

劉家庄村南でも殷代墓葬62基の発見があり²⁸。殷代版築基址一個所がある。劉家庄村南のこの付近の墓地出土の銅器の中には「息」²⁹「史」「夕」の三つの族徽銘文があり、劉家庄村のこの付近がこの三つの族の家族墓地であった可能性を示している。

劉家庄村北遺跡では灰坑、窖穴、住居、水井、道路、墓葬の発見があり、その中で発掘した殷代墓葬は195基に達している³⁰。出土の銅礼器16点の中では、4点に「𠄎父癸」の三字を鑄出すものがあり、「𠄎」³¹は族徽銘文であり、「𠄎」字は過去の著録の中でも記載が非常に多く、「𠄎」が当時の一つの大族であり、殷墟の晩期に、劉家庄村北の地一帯に「𠄎」族の墓地が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また灰坑、窖穴、住居、水井、道路の発見も、この一帯が「𠄎」族の居族葬地の一つであったことを表している。

劉家庄、徐家橋東南方向の梯家口村西では、1985年以来殷代墓葬30基近くが発掘され³²、この墓地の中のM3から出土した銅鼎内に「羊觶」の族徽銘文があり、この一帯の殷代文化遺跡では灰層、窖穴等の分布があることは、梯家口村西が「羊觶」の家族族居族葬の地であったことを表している。

殷墟小屯村の西南約4キロメートルの東八里庄村では、1991年以来商代道路、灰坑と5基の殷墓の発見があり、墓の中から出土した一点の銅爵上に「𠄎己」を鑄出している。「𠄎」は族徽銘文であり、過去の著録中に非常に多く、近年殷墟苗圃南地、戚家庄村東地などの墓地の中から、「𠄎」族徽銘文の発見があり、これは一つには「𠄎」族がいた殷墟の居地が一個所にとどまらないことを示し、もう一つには東八里庄村東のこの墓地も、「𠄎」の一つの家族的墓地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2001年春、八里庄村北でも一個所の晩商遺跡を発掘し、商代大型灰坑、20余基の商代墓葬（その中に4基の保存が良い商代貴族墓葬がある）を発見し、さらに1基の住居面積が100平方メートル以上の比較的大型の版築建築基址一基があり³³、当地の貴族の居所であったと推定できる。これらは東八里庄村東の墓地と関係して一体のものであり、この一帯の居址と墓地は、「𠄎」族の一つの家族の族居族葬の地であり、その族人の中には貴族と平民がいた可能性が非常に高い。

八里庄の北に、殷墟西南の戚家庄村東遺跡が位置し、1982-1984年に殷代墓葬197基が発見され、墓地の中から出土した銅器に銘文をもつものが43件あり、9種の異なる銘文に分かれて、「爰」、「寧觶」、「鉞觶」などを含んでいる。その中で、M269墓葬出土の「爰」徽銘をもつ銅器は25点あり、M63出土の「寧觶」徽銘をもつ銅器は7点、M235出土の「鉞觶」徽銘をもつ銅器は3点ある。この一帯は分布が比較的密集する墓葬のほか、殷代の灰土層、灰坑窖穴などの遺跡もあり、

この一帯が殷商晩期に、人口が比較的緻密であり、発見された「寧簋」、「鉞簋」、「爰」などの徽銘文から、戚家庄村東が「寧簋」、「鉞簋」、「爰」などの族氏の族居族葬の地であったと判断できる³⁴。

殷墟西北辺縁の範家庄の南では、1997年に殷墓11基が発見され、その分布は比較的集中している。さらに商代の灰土層、灰坑、窖穴などの遺跡が発見されている。墓から出土した銅器の上には「光」字の族徽銘文がある³⁵。「光」の族徽銘文は、過去の著録の殷墟銅器の中に記載があり³⁶、1987年殷墟郭家村北の殷代墓地中でも「光」族徽銘文がある銅器が発見され³⁷、範家庄村南の「光」族墓地は、殷墟文化第二期、郭家村北「光」族墓地は殷墟文化第四期に属する。この両所の家族墓地の族は関係があると考えられ、特に範家庄村の南の遺跡は、一つの家族の族居族葬の地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上で述べた殷墟の分布的特色を総括すると、第一に、殷墟には一つの中心があり、それはまさに宮殿宗廟区と王陵区であって、殷墟の配置の中心的地位にある。近年、宮殿区内で苑池と導水施設の発見があり³⁸、ここが宗廟宮殿の外に除かれること、また苑池水樹があり、これらが王室生活の多方面の需要を満足させ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この苑池水樹の配置は、偃師商城では宮室の北辺の非常に整った場所にあることとは異なり、明らかに近くの洹河とそのカーブする流路の地形環境を活用していて、それは殷人が地勢に適した規格を意識していたことを、反映している。

第二に、宮殿区とその付近に王室と貴族の墓葬を配置し、これは殷墟の配置のもう一つの特徴である。例えば、小屯村西北には婦好墓と「子漁」「𠄎侯」（征侯）など五種の銘文がある18号墓、「韋」字の銘文の17号貴族墓などが分布し：小屯村西、今の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基地内でも二条の墓道をもつ大墓が発見され；小屯村南の花園庄村東でも「亞長」の族徽銘文のある54号貴族墓があり；小屯東南辺の後岡の墓葬群の中には、その最高身分者である王室貴族がいた。

第三に、宮殿区に宮室と墓葬の両種を配置しそれが、殷墟のその他の地方貴族と族衆に影響を及ぼし、そのため、殷墟ではおよそ墓葬が集中する地区では、それぞれに居址の発見があり、さらに居址があると、墓葬と手工業工房が一つの遺跡の中に集まり、殷墟の各族の族居と族葬が不可分であるという特色が形成され、また単独の「族墓地」を除いて、殷墟の族居族葬毎に墓地と居地からなる族居族葬を形成したと、我々は考えるに至った。王陵のように、在国の人の中でその特殊な政治、宗教の関係から王陵区外での埋葬を避けたものを除いて、上は王室貴族、下は貴族と普通の族衆に至るまで、一般に、すべて墓葬は居所に埋葬するものであった。

居住はある種の程度の衆族居であり、そのため墓葬もまた代々の衆族葬であった。この種の衆族居について、『殷墟「大邑商」』中の『族邑』とする学者がいて、一枚の『殷墟「大邑商」族邑分布示意図』が示されている（図10）³⁹。筆者はその主導思想はよしとするが、但しこのような衆族居の族と族の居地の間には明確な溝・濠あるいはその他の区画の標示はなく、そのため、これら一つ一つを「族邑」と称するには、さらに一步の斟酌を進めるべきである。實際上、殷墟の族居形態は王権支配下の大雑居中の小族居であり、すなわち殷墟が大単元であって、個々の族は混雑的であり、個々の族の小単元は、族衆居的である。甲骨文によると、殷人は自己の殷都を「大邑商」あるいは「王邑」あるいは「茲邑」等と称していたが、ただし「王邑」すなわち「大邑商」の中の小族居に対しても、「邑」と呼べるかどうかは、甲骨文でもまだ説明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そのため。「大邑商」の中の個々の族居点に対して、筆者はそれを「族邑」とは称さず「族居」と仮称し、その方がこの種の大雑居の中の小族居の性質と特色を説明するのに有利である。

第四、武丁が都を洹南に移した時に小屯一帯の洹水に近接した場所に建設し⁴⁰、この自然地理的地形条件の影響を受けて、また殷人衆族居の特色が加わり、小屯宮殿区また晩商王都中心区の配置と鄭州商城および洹北商城と異なることになった。小屯一帯では、我々は宮殿区内の中軸線がどこにあるかまだ分からない、あるいはここにおける中軸線は明確ではなく；また縦横の大路の区画や城市の規格設計についてまだ分かっていない。おそらく、殷墟各族内部と個々の族居地点の間では疑いなく人々が往来し馬車が走った大小の道路が存在したが、ただしそれらはおそらくその必要により、また地制によって、当時の地形地貌を考慮して修築あるいは形成したのであろう。

第五、殷都には王陵だけからなる地区があるが、ただし婦好などの王室成員はかえって王陵区に埋葬せず、宮殿区で埋葬し、殷墟の王陵区への殷王の埋葬にはこのような問題があり、そこにその特殊な意義があった。学者が指摘するように、西北岡を埋葬と祭祀だけをおこなう王陵区としたのは、王陵区が当時都城内の唯一で最も重要な臣民が集まり参与する国家祀典の公共場所であったからである。この種の公共場所の設立は、疑いなく王権意識を涵養強化し、国力国威を発揚するものであり、それは諸侯と臣民の求心力を強める重要手段であった⁴¹。なおさらに説明を補うならば、商代の王と王室のその他成員とには、生きている時は勿論死後にも、国家の中での役割と地位に本質的な差異があった。甲骨文中には勿論、文献の中でも、商王都には「余一人」の呼称があり、卜辞の「癸丑卜、王曰貞、翌甲寅乞（帝）自上甲衣至于后、余一人亡禍？茲一品祀。在九月。・・・」（『英藏』1923）は、その禍が余一人すなわち王の身上のものと認識されたことを示し、これはまさに殷王統治の世界が王一人によって体现されたことを説明している⁴²。王が生きている時は、世俗王権の管掌者であり、また神と人の間の仲介をして；王が死ぬと神霊となり、彼は商の王室の祖先神となり、また商族の祖先神の一人となり、さらには王国の帝の外の最高神の一人であり⁴³、かつ卜辞中には帝に対して祭祀を行ったことは見えず、祭祀の授受の角度から言うと、殷人が祭る最高神はまさに死後の商王であった。殷王が統治する世界は王一人が体现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た先王に対する祭祀が絶対であるという商王室の事情があって、それは王国の一大事であり、こうして、王陵は当然に臣民が集まり国家祀典に参与する公共場所となったのであり、王陵での祭祀の挙行時に大量の人犠（殉葬者）を使用したことから、これを所謂専制君主制的の暴虐行為とみなす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って、一種の宗教的必要に基づいて行なったのであり、当時の人からみると、大規模な地の祭祀を通じて、先王の神力を強め、祖神が必要とするものを満たして、それが王国のすべてに一種の福音をもたらし、そのため、死去した王を我々が今日王陵地区と称する一個所に集中的に埋葬して、かつ恒常的に国家の級別の、すなわち多くの族氏から四方侯伯まで参加する祭典を挙行したのであり、それは当時の政教合一の神権政治が然らしめたものであった。王室のその他の成員は王のような特殊な役割をもたず、そのため当時の族居族葬の習俗に従い、宮殿区内あるいはその付近に埋葬したのであろう。

2 安陽殷都の族氏構造

安陽殷都の居住の特色は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大雑居小族居」であるが、「小族居」の中では、その族氏の構造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であろうか？『左傳』定公四年では、周初の分封時に、魯侯伯禽に「殷民六族」を分給し、ならびに「その宗氏の帥に、その分族である丑類を集めさせた」と述べている。多くの学者はこの「宗氏」と「分族」を宗族と家族の二つの階層の組織と理解して、殷人の族氏構造をいくつかの血縁家族が宗族という構造を形成したと認識している。

1979年、殷墟西区の発掘で939基の墓葬資料が得られ（図11・12・13）、発掘報告の編著者は墓地の分区と分群について、殷墟西区の八墓区が「宗氏の一級組織に属し、墓区の中の各墓群は分族に属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と提案し、すなわち殷墟西区の墓地の中の「墓区」「墓群」の関係が『左傳』定公四年にいうところの殷遺民中の「宗族」と「分族」の関係であると説いた⁴⁴。その後、葛英会先生撰文で、殷墟西区内を包括し、大司空村南地、後岡南地の墓葬を含めて、具体的な分区と分組の区分をさらに一歩進めて、「各区、各組群は異なる族集団を代表して、区と組の区分は族集団の異なる等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考えた⁴⁵。朱鳳瀚先生は殷墟西区の墓区と墓群の区分をこの種の二つの階層の親族組織の区分とすることは簡単に過ぎるとして、墓区の三つのクラスの親族組織すなわち「大群」、「群」（宗族）、「組」（主に直系家族）という区分を提出した⁴⁶。その他、唐際根⁴⁷、韓建業⁴⁸諸氏もまた、墓地内の墓葬の間の疎密程度と随葬器物の組み合わせの状況、あるいは殷墟西区各区墓地や八区の中の一つの墓地について、具体的な分群や分組の区分を行なった。現在の問題は、第一に、各位の区分者は区分を進める時にすべて墓葬分布相互間の距離の遠近や疎密と葬俗（葬送習俗）の特性について考慮しているが、ただし諸氏の区分した組群やいくつかの墓組成はみな、互いに差異があり、一致させることが難しいことである。第二は、区分した所の墓区、墓群、墓組と族組織の級別階層をどのように対応させるかについても、また諸説は同じではない。

上述の各位論者において墓群と墓葬の境がどのような親族組織と対応するかについては、異なる理解と異なる階層区分の理解があるが、ただし大多数の論者はいくつかの同宗の家族がある一つの宗族を構成する問題として説明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かし、我々が墓区の分群、分組と出土した族徽銘文を対照してみると、同一墓区あるいは一つの「大群」がすなわち同一の宗氏（宗族）と関わるという結論を得ることは非常に難しく、同一宗族の人をかえて異なる居址異なる墓地の中に葬ることがあった。例えば、殷墟西区第三墓区（図11）出土の族徽銘文は15種の多きに達し（図12）、その中の東南角の一組11基墓（M674, 675, 676, 687, 688, 689, 690, 694, 695, 697）の中のM697から一点の「丙」という族徽銘文のある銅器が出土した（図12・13）。「丙」という一族徽銘文を考察すると、我々はこの一族氏徽記銘文が最も多く出土したものと山西靈石旗介の商墓を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山西靈石旗介商墓の出土物の中では、族氏徽銘文を鋳出した42点の銅器の中で、「丙」形の徽銘文をもつものが34点あり⁴⁹、したがって「丙」という一国の族の本家すなわち宗族は山西靈石旗介にあり、かつ殷墟に居住して、死後殷墟西区墓地に丙国の在商王朝官吏およびその家族として葬られたのである。これを換言すると、我々はM697出土の「丙」の徽銘とこの墓区から出土したその他の14点の族徽銘文が同一の宗族に属するとすることは難しく、すなわち、我々は第三墓区東南角のM674-M697という十一基の墓を「丙」

を族徽銘文とする一つの家族墓地ではなくこの一家族と同一墓区（第三墓区）ないし近くの第二墓区のその他の家族は同一の宗族に属しないとみるべきである。

丙の本家すなわち宗族が殷墟にいなかったことは、甲骨文からも証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甲骨刻辞の中に「丙邑」（『合集』4475）があり、すなわちそれは丙国の都邑である。卜辞の中に、我々は「王令丙」（『合集』2478）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が、ただし「婦丙来」（『合集』18911反）の記録がある。婦丙の呼称は丙族と商王朝に婚姻関係があることを表し、「婦丙来」についてもう一步説明すると、殷都の角度からいうと、婦丙の丙族は外来者であった。丙国の丙族が王朝で官吏となる情勢について、我々は以下の一節でもう一步論述を進めよう。

第三墓区の西北方向のM699では「中」の族徽銘文があり、第六墓区のM1080でも「大中」の族徽銘文があって、「大中」は「大」と「中」を組み合わせた複合型の徽銘であり、この種の複合型徽銘は、家族と宗族の間関係を反映して、それには分支の類の関係があり⁵⁰、短期的な連合関係であった可能性もあるが⁵¹、この第三墓区の一基と、第六墓区のもう一基は、第三墓区と第六墓区の間にさらに第四墓区があり、「中」と「大中」は同一の宗族の二つの家族であったが、それらは二つの墓区に分けられていた。

また、第四墓区M1116では「束」の族徽銘文の出土があり、第八墓区M271でも「束乙」族徽銘文の出土があったが、これらもまた同一宗族の両家族が異なる墓区の中に分け隔てられていたものである。同様に「告寧」族徽銘文が、第四墓区のM1118から2例の出土があり、第七墓区のM907でも一例の出土がある。第七墓区南区西部のM907墓葬では「告寧」のほか、「共」、「日辛共」と「亞共」の出土があり；第七墓区北区のM93墓葬でも「共」と「亞共」の出土があるが、第七墓区の南北両区は100余メートル離れている。

「告」と「寧」の相関的族徽銘文は、殷墟西区のほかでは、殷墟南区の劉家庄北のM2墓葬で「寧」字族徽銘文の1点の觚の出土があり、「寧父乙」の族徽銘文の爵1点もあり、劉家庄北M1墓にも「寧」字族徽銘文の1点があって⁵²；殷墟西南方向の戚家庄東のM63墓葬で「寧簋」の銅簋が1点、銅罍が1点、銅觚が2点、銅爵が2点、銅卣が1点出土し、7点の多きに達している⁵³。この中の、「簋」の本来の意味は官名であり、甲骨文中に「多簋」と「左多簋」があることから、研究者はこれを商代の武官の一種としてきた⁵⁴。「寧簋」族徽銘文の出現は、「寧」族中のある一家族が長期にわたって「簋」の官職を担い、そのため「官を氏として」、「寧簋」と署名し、「寧簋」はすなわちこの一家族の徽銘となったのであり、それと「寧」と単書する者が同一の宗族に属することには問題がない。殷墟南区の劉家庄と殷墟西南区の戚家庄は2.5キロメートル離れ、殷墟西区の第四墓区は3キロメートル離れていて、これらも同一宗族の異なる家族が殷墟の異なる場所で族居族葬を行なった一事例になるものである。

殷墟劉家庄南のM63では2点の「息」銘銅器の出土があったが、息族銅器が集中して発見された地方は河南羅山県蝶張郷天湖村の晩商墓地である。前後三次の発掘による20基の晩商墓地の中で、銘文のある銅器40点の出土があって、「息」銘文の銅器墓が9基あり、商代墓の全体で41%をしめ、特に10基の中型墓では8基から「息」銘銅器が出土して、80%を占める⁵⁵。多くの学者は羅山県天湖墓地が息族の墓地であると考え⁵⁶、何ら疑問はない。甲骨刻辞の中には、「婦息」（『合集』2354白）があり、また「息伯」（『合集』20086）もある。息族は伯称をもち、当時の畿外の侯伯の国に属したが；息婦の存在は、息と商王朝の婚姻関係が存在したことを表し、劉

家庄南 M63 出土の「息」銅器は、息族人が商王都に官吏としていたことを表している⁵⁷、このように、息族の本家は羅山天湖一帯にあり、殷都にいたものはその一家族であったのである。

このほか、「韋」族の族徽銘文として、我々は小屯村北 M17 墓葬出土の「韋」徽銘文を鋳出した一点の青銅觚をみる事ができ⁵⁸；殷墟西区墓地第一墓区 M2508 墓葬出土の 1 点の銅鼎、一点の銅爵と 1 点の銅觚上には、「子韋」の徽記銘文を鋳出し⁵⁹、梅園庄南地 M92 墓葬出土の青銅觚上にも、「冊韋」の徽記銘文があり⁶⁰、苗圃北地の M54 墓葬出土の青銅上には、「弓韋」の徽記銘文を鋳出している⁶¹。これらの銘文中で、「子韋」は殷墟西区墓地第一墓区付近に韋族宗子の墓葬があることを表し、「冊韋」は梅園庄南地に「冊」すなわち「作冊」の職官に任命された韋族の家族がいたことを示し、「弓韋」は苗圃北地に弓箭を官職とする韋族の家族がいたことを表している。これらはすべて韋宗族に属しその中に朝廷任官者がいて、彼らは朝の官として、自ずと殷墟に居住したのであり、それらは同一宗族であるが、朝廷で官吏としてあり、そのため埋葬や居住が殷墟の異なる場所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上述の例証と分析をおこない、また、我々が先に上げた苗圃北地遺跡出土の「亞鬲」、「寧趾」、「」などの徽銘；大司空村遺跡から出土した「洋」、「古」、「見」などの徽銘；郭庄村北遺跡から出土した「羊」、「単」、「光」などの徽銘；劉家庄村南遺跡から出土した「息」、「史」、「夕」徽銘；郭家庄遺跡出土の「亞址」、「亞胡址」、「中」、「𠄎」、「兄冊」、「作冊兄」、「郷寧」などの徽銘；戚家庄村東遺跡から出土した「爰」、「寧觚」、「鉞觚」などの族徽銘文についてさらに一步推論を進めると、すなわちまずそれらが地区毎に多くの族氏が族居し；その次に、一地区の族氏の構成の関係について、それらを一定の「宗氏」と「分族」という種類の構成関係ではないことが明らかであり、またいくつかの遺跡で諸族氏が一つの地区に集まり、相互の関係が同じ宗族に属さ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ことを否定できない。

このように、『左傳』定公などの文献材料から、我々は商代に「宗氏」と「分族」という二階層の親族組織組織の構造があったとみる事ができ；殷墟各所の墓地資料の中の墓葬の空間分布と配列組み合わせから、我々は墓群と墓組を区分でき、この種の同一の墓地の中の墓群の組み合わせの中に「宗氏」と「分族」という二階層の親族組織結合があった可能性は排除できないが、ただし上述の多くの例で説明したように、殷都の中で、同一宗族の諸家族が異なる場所で族居族葬を行ない、それは殷都の多くの貴族と族衆が家族の形式で集合居住していた可能性を反映している。このことから、筆者は、理論上は商代に「宗氏」と「分族」のような宗族組織構造があったと考えるが、ただし晩商の殷都では、実際的情況は宗族の形式で族居族葬した者がいた可能性を全く排除できないが、多くの居住者は家族の形式で族居族葬したのであり、これは晩商王都の族居族葬の基本単位が家族であって家族より上の宗族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を説明し、これを換言すると、晩商の商王都では、商の王族と一部の強大な宗族が宗族と家族が結合した構造の組織で存在した可能性はあるが、ただし王都内のその他の異なる族に属する族人達はそれぞれまず家族の形式で出現したという現象が、家族を単位として成立した大雑居小族居という晩商王都の族居の主要な特色であり、それは王都内の地縁性すなわち親族組織の政治性が他の地方に比べてやや発達していたことを反映し、それは商代親族組織の血縁関係が王権に服務的であり、王都のこの種の族居の特色は、商代の都鄙構造の一様相であって、都は商王の統治方式と関係して晩商王都の族居の主要な特色と一体のものであった。

3 殷都の族氏の構造と関連する王権

商の王権およびその統治方式と商代の国家構造および殷都の族氏構造はすべて関係するものであった。筆者はかつて商の国家構造が一種の「複合型国家構造」であると提言したが⁶²、この種の「複合型」国家の中で、商王は「天下共主」であり、彼（商王）は王邦すなわち後世の所謂「王畿」地区を直接統治し、また臣服あるいは服属する他の侯伯の国を間接に支配し、このような多くの侯伯の国は「庶邦」と呼ばれていた。商王の「天下共主」の地位は、王邦すなわち王畿地区がその他の衆邦やその他の庶邦に対して「国上の国」であったが、所謂庶邦は、夏代にすでに存在した一つ一つの邦国であり、商代になってそれらは商王朝の地方一級権力機構になったのではなく、いくつかの邦国が商王朝に臣服あるいは服属したが、その邦国の主権の変更は不完全であり、その主権は完全に独立はしていないが、邦国のその他の機能はすべて存在して、王朝内の「国中の国」を形成していた。そのため、商王朝の構造は、王邦と多くの諸邦が形成し、複合的であり、数学における複合関数と同様に、関数内にいくつかの関数があった。王が天下共主の王朝にあって、半独立的な個々の邦国の君は、その国内では国家君主の権力をすべて行使し、各邦の間関係も国と国の間関係であり、そのため天下共主の商王は各地の諸邦に対して間接的な統治あるいは支配を施行しただけであった。王畿が特別であるのは王都の範囲内であり、商王が直接的な統治と支配を施行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からである。この種の間接支配と直接支配が結合する統治方式は、複合型国家構造における王権の一大特色であり、王権と王都範囲内の直接支配は王都内の族氏構造に直接に影響していた。

王畿外の侯伯に対して、商王は一貫して彼らに朝（朝廷）中の要職を担当させてこれを朝臣としたが、卜辞の中では彼らを「多君」と呼び、『史記・殷本紀』で商紂が西伯昌、九侯（鬼侯）、齔侯を三公としたと述べることなどが、明らかな例である⁶³。彼らは朝臣であり、殷都に居住する必要がある時には、族居すなわち家族の形式で殷都に居住したであろう。権力は空間限定的であり、商王の邦国の支配は間接的であったが、彼ら本人およびその殷都に居住する家族の調遣と支配は、直接的であった。

また卜辞の「小臣醜」（『甲骨文合集』36419）と山東青州蘇埠屯出土の徽銘である「亞」、もまた畿外の侯伯あるいは服属国が王朝で官吏になった例である。東青州蘇埠屯一号大墓は四条の墓道をもち、墓室面積が56平方メートルに達して、殉犬6列、殉人48人の大規模な墓葬である（図14・15）⁶⁴。蘇埠屯遺跡は未発掘の城址であるが、この種の四条の墓道がある大墓の規格は殷王陵と同じものであり、かつ遺跡出土の「亞醜」族徽銘文を鑄出した大銅鉞が出土し五六十点の伝世銅器にもすべて「亞醜」の記銘をみることができ（図16）⁶⁵、亞醜は最初には商王が東土に派遣し、蘇埠屯に在住した武官で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が、時間が推移するにつれて、その後外在の諸侯に発展し、また同時に王朝の小臣の職を兼任して、「小臣醜」と称したものである。王朝で任職すると、当然彼と彼の家族は殷都に居住する必要性が生じ、多くの異なる家族が「大雑居小族居」の方式で殷都の各地に混居することとなった。

先にあげた丙国もまたこの種の情況にあった。丙国派遣の人が王朝で官吏となったことが、いくつかの伝世の丙国銅器銘文から証明できる。『統殷文存』下18.2の著録に一つの爵があり、「丙」の下に一つの「亞」の枠（かまえ）があって、「亞丙」と読み、年代は殷墟文化第二、第三期である。

この「亞」は、すなわち『尚書・酒誥』に「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の亞であり、この原本の内服は王畿内の官職であって、「亞」形の記徽と「丙」形の記徽を組み合わせて合成した複合型記徽であり、これは古代に官職を徽号としたことにより、『左傳』隱公八年衆仲が「賜姓」，「命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としたものにあたる。そのため、「丙」の下に「亞」の枠のあるこの種の「亞」符号の族氏記徽は、功績をあげて官族になって以後その族氏記徽を銅器上に鑄出したのであり、それによって自己の身世尊榮の一例証を顕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のほか、丙族は商王朝にあってかつて「作冊」の職を担当し、『丙木辛卣銘文』写作：『丙木父辛冊』のとおりである⁶⁶。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収録の鼎と卣にも「丙」形記徽銘の二篇の長篇銘文があり⁶⁷、鼎銘（図17）には作器者がある地で商王から貝を賞賜され父丁のために作器したことを記載し、卣銘（図18）には作器者が廩地で商王の賞賜を受けて毓祖丁のために作器したと記載している。これらいくつかの記述は丙族の首領が商王から官職封号を受け、王に服務するため、王の賞賜を受け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これは丙国丙族の人が官吏として在朝し、彼らが殷都に居住して、自然に殷都の「大雑居小族居」を構成したのであり、王権の支配からみると、遠在の山西靈石旗介の丙国丙族の本家に対しては、商王が間接支配を実行し、殷墟に居住する在職の丙族のある一家族に対しては、商王が直接統治を実行したのであり、あるいは商王がまさに殷都に居住する任職の丙族のいくつかの家族を直接統治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遠在の山西靈石旗介の丙国と丙族を間接支配したと言うことも可能である。

前述の「子韋」，「冊韋」，「弓韋」，「典韋」の韋族は、『詩經・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の韋であり、河南省滑県にいた。甲骨文「戊寅卜，在韋師，人無「戔異，其藉（『合集』28064）により、韋族は自己の軍隊をもち、農田があったこと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韋族の族長は子韋であり、その領地は子韋自身が支配と管理を行っていたに違いなく、複合型の国家構造と商の王権からいうと、商王は韋族領地に対して理念上の支配権があったであろうが、その実際の支配は当然子韋を通しての間接的な支配を行い、「冊韋」，「弓韋」，「典韋」のような官吏として在朝した韋族のいくつかの家族については、商王は彼らを当然直接的に支配し、かつ王権の作用から、彼らは同一宗族であったが、みな官吏として朝廷にあり、殷墟の異なる場所で埋葬あるいは居住したのである。

最近発見された殷墟花園庄54号墓は官吏として在朝した有力貴族の一基の墓である（図19）。墓から出土した青銅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貝器、竹器、象牙器、金箔、貝など各級の器物は570余点に達し、その中に銅鉞7点と大型の卷頭刀および大量の青銅戈、矛などの兵器があり（図20・21）、また出土の青銅礼器には、その多くに「亞長」の二字の銘文がある（図22）。「亞」は武職官名であり、これと墓に大量の青銅兵器を随葬したことは符合し；「長」は甲骨文中の「長」族の長である。このことから、発掘者は54号墓の墓主を「長」族の首領であり、それは一人の兵権を握った有力貴族であったと考えた⁶⁸。甲骨文中には、長族の邦君が一時期「長伯」と呼ばれ（『合集』6987正）、廩辛康丁の時期に至り、「長子」の呼称が出現した（『合集』27641）。卜辞中では長族が「長友角」，「長友唐」を領したことも有名である（『合集』6057正，6063反など）。長伯の封地はすなわち長と呼び、商王は長地に関心をもち、「長不其受年」と卜問している（『合集』9791）。商王はまた恒常的に長族と連絡をとり、常々「往于長」と官員を卜問に派遣し（『合集』7982，『懷德』956）、また商王親が自ら長地に行った記録がある（『合集』767反，36346、

36776)。長がどこにあったかについては、長は方，羌（『合集』495）と交渉があり、今の山西長子県西郊の春秋時期の「長子」の古地名があるなどの状況から、すでに故林歆博士が「長」族の原居が今の山西長子県にあり、河南鹿邑県太清宮の長子口墓の墓主は商の亡国後に南遷した「長子」族の首領と考えた⁶⁹。おそらく、花園庄54号墓の墓主は商王の祖庚祖甲時代に長族が殷都に派遣して殷都に居住した在朝武官の大貴族であった。

また、今の安陽梅園庄村一帯の、小屯宮殿から約2キロメートル東北に離れた場所に、一つの集居と墓地が一体となった居址があり、「光」などの家族の徽銘をもつものが出土しているが、卜辞中に、我々は「光」が「侯光」とも呼ばれていることをみることができ、侯伯の類の諸侯に属して、「丙寅卜，王貞：侯光若往彘嘉侯光・・・・」の如くである（『合集』20057）。「侯光」の諸侯領地が殷墟梅園庄に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ことは、梅園庄一帯から出土する徽銘は「光」にとどまらず、「単」，「冊韋」，「天鬲」などの族があり、梅園庄一帯出土の「光」徽銘は、光侯の中の一つの家族であって、光侯国族中の官吏として朝廷にあった者である。卜辞中には、商王が「光」に「羌芻」の送致を要求し：「甲辰卜，亘貞：今三月光呼来？王占曰：其呼来。迄至惟乙，旬又二日乙卯，允有来自光，以羌芻五十。」（『合集』94正）とあり、また「光」が羌を獲るかどうかの卜問：「貞：光獲羌？」（『合集』182）「光不其獲羌？」（『合集』184，185）「光来羌」（『合集』245正）もある。これらは商王が光侯国の族中の官として朝廷にある家族を直接支配して、かつ殷墟に在住する光の家族を通して光侯のような国族を間接的に支配し、彼らに「羌芻」を送致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これらを総合すると、商王は王畿以外の侯伯国族すなわち庶邦の間接支配と王都内の同姓と異姓の多くの家族あるいは宗族の直接支配という二つの方式をとり、『尚書・酒誥』にいう「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と完全に一致し、さらに『酒誥』の記載と『大孟鼎』「惟殷辺侯田粵殷正百辟」銘文とも対応して、現在我々はこれらと殷都の族居の特色と王権の支配方式とが相関するため、『酒誥』で述べることには根拠があり、信頼できると考えている。『酒誥』の内、外服の区別は王畿と甲骨文の所謂「四土」の区別に相当する。王畿の中に、周代の畿内の諸侯のように、侯の領地があるとする説もあるが、ただし王畿における内服の主要な特色は朝（朝廷）の官的な朝臣にあり、その居邑はまた王族と各種の職官を管掌する貴族大臣の族邑と呼べるものであった。王権の視角およびその権力の空間範囲の議論からは、商王の支配力は家族・宗族の一つの側面に由来し、それは王都に分布する家族宗族の直接的な統括の範囲の縁故によるものであり；また多くの異姓家族が殷都の中に特別に散居でき、また彼らは朝廷の官吏であった。まさにこの関係によって、王都内の小族居と大雑居の統一がなされ、晩商王都内の地縁性すなわち親族組織内の政治性が他地域よりも発達していた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参考文献）

- ¹ 王震中：《“中商文化” 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 ²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5期。
- ³ a. 唐际根，徐广德：《洹北花园庄遗址与盘庚迁殷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4日。

- b. 杨锡璋, 徐广德, 高炜:《盘庚迁殷地点蠡测》,《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 c. 岳洪彬, 何毓灵:《浍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 d. 王震中:《“中商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 ⁴ 岳洪彬, 何毓灵:《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 ⁵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59年,台北。
- 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河南安阳殷墟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5期。
- 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小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7月。
- 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 ⁹ 岳洪彬2005年1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4年度田野发掘成果汇报会”的报告。
- ¹⁰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第329~330页。
- ¹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 ¹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21页。
- ¹³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 ¹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33页。
- ¹⁵ 岳洪彬2005年1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4年度田野发掘成果汇报会”的报告岳及2005年1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报告。又见岳洪彬,何毓灵:《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5日。
- ¹⁶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 ¹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这项发掘的队长为王学荣先生。另参见岳洪彬,何毓灵:《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5日。
- ¹⁸ 由于家族内口粮,日用品的需求,这些家族或宗族在从事某种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的同时,每每也兼营农业,渔猎,纺织等生产,所以,在有些手工业作坊遗址中也出土农业,渔业和纺织等生产工具。
- ¹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16~12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46页;《殷墟考古又有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31日。
- ²⁰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 ²¹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19页。
- ²²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页。
- ²³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4页。
- ²⁴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博物馆:《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
- ²⁵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²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月。
- ²⁷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徐家村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²⁸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66~77页。
- ²⁹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 ³⁰ 发掘者将此字释为“享”。这里从严志斌博士释为“息”,参见严志斌博士学位论文《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
- ³¹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³² “举”字较复杂,最初孙让将其隶定为“析子孙”,罗振玉从此说,也有人将其隶定为“冀”,于省吾先生将其隶定为“举”,这里从于说。
- ³³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

- ³⁴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 67 页。
- ³⁵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 9 页。
- ³⁶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第 9 页。
- ³⁷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
- ³⁸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家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 年第 10 期。
- ³⁹ 参见岳洪彬 2006 年 1 月 5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5 年田野工作汇报会”上的报告。
- ⁴⁰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 年第 3 期，第 86 页，图二。
- ⁴¹ 在殷墟宫殿区的范围内，甲，乙，丙三组基址的一些基址以及 1989 年发掘的位于乙组基址南约 80 米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应该较早；诸如小屯村西即今考古所安阳工作站一带的大型夯土建筑应该是宫殿区在向西扩展的过程中，逐渐扩展出来的。
- ⁴²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 年第 3 期。
- ⁴³ 伊藤道治：《王权与祭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 ⁴⁴ 学术界一般多认为卜辞中的“帝”是商代的最高神或至上神，笔者认为卜辞中的帝比较特殊，说它是殷人的至上神，有些特征又不太完整，它处于正在走向至上神的发展途中。参见王震中《帝并非商之始祖》，《殷都学刊》2004 年第 3 期。
- ⁴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 1 期。
- ⁴⁶ 葛英会：《殷墟墓地的区与组》，《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7 年。
- ⁴⁷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105～123 页。
- ⁴⁸ 唐际根：《殷墟家族墓地初探》，《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 ⁴⁹ 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 年第 1 期。
- ⁵⁰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2 期；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 年第 7 期。
- ⁵¹ 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
- ⁵² 严治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第 142, 155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 4 月。
- ⁵³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第 1～21 页。
- ⁵⁴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第 1～21 页。
- ⁵⁵ 陈梦家：《殷墟卜辞研究》，第 511 页。
- ⁵⁶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 年第 2 期。
- ⁵⁷ 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 ⁵⁸ 严治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 4 月，第 169 页。
- ⁵⁹ 发掘者将此铭文释为“卫”，见《考古学报》1981 年第 4 期第 511 页。应释为“韦”，参见杨树达：《韋父丁鼎跋》，《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 29 页；周永珍：《殷代“韦”字铭文铜器》，《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 年。
- ⁶⁰ 参见《殷墟青铜器》六四，六五，六六诸器说明辞，第 449～450 页。
- ⁶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 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考古》1986 年第 2 期。
- ⁶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 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 年第 2 期。
- ⁶³ 王震中：《商代的王畿与四土》，《殷都学刊》2007 年第 4 期。
- ⁶⁴ 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 ⁶⁵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 年第 8 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年。
- ⁶⁶ 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

王震中

⁶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第 84 页，5166，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01 年 10 月出版。

⁶⁸ 分别见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4·10·2 和 13·38·6，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⁶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花园庄 54 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 年第 1 期。

⁷⁰ 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 年第 2 期。关于长子口墓，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周初封于宋地的微子后的墓葬，参见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0 年第 4 期；松丸道雄《河南鹿邑県長子口墓をめぐる諸問題 ---- 古文献と考古学との邂逅》，《中国考古学》第四号，2004 年 11 月。

Residential Space Arrangements in Shang-Era Yindu and Shang Kingly Authority

WANG Zhenzho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Yinxu, the king's capital city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 was large in scale, covering an area of thirty-six square kilometers. In addition to the spaces occupied by the king's palace and the royal mausoleum, it had an area where many people of high and low status resided, and it had many workshops for handicrafts. These dwelling areas and workshops posse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eater mixed dwelling and lesser clan dwelling" (seen through a wide-angle lens, they were mixed dwellings; seen through a telescopic lens, they were clan dwellings). The phrase "greater mixed dwelling" expresses the condition of Yinxu as a place where many clans with different surnames dwelled, mixed among themselves. "Lesser mixed dwelling" refers to the pattern of in which clan members, within a small defined territory, reside in single units comprised of families (*jiazu*) or patriarchal lineage groups (*zongzu*) and conduct clan funerary rites. Upon close analysis of sources on clan symbols and inscriptions such as *xi* 息, *guang* 光, *bing* 丙, *wei* 韋, *zhong* 中, and *gong* 共,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although the Shang royal family and powerful clan lineages may have acted as large patriarchal lineage organizations in making residential space arrangements in Yinxu, other families who were not among the royal or powerful clans operated at the family-unit level, in almost all cases, in making dwelling arrangement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he clan dwelling areas of the capital city seems to have been that they were places where organizations of people who were related by blood performed service to the Shang-period kingly authority. The Shang state structure was complex, made up of the *wangji*, "the king's domain," and the *situ*, "the four lands." The king lived in the *wangji* and ruled it directly; it was also called "the king's country" (*wangbang*). The *situ* were all the other territories under his authority—principalities governed by lords who had pledged their fealty to the Shang king. Those lords posted important persons permanently in the king's capital city, charging these men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fulfilling administrative duties at the Shang court.

The Shang king exercised direct control, or governance, over the ministers at court and their families who were resident in the *wangji*. Over the *situ*, he exercised an indirect rule through the various families that had been assigned by the lords of those lands to live in the capital and perform official duties. This system made it necessary for there to be many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surnames in residence, working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rt, in the king's capital of Yinxu. Because of this system, the most frequently occurring pattern of residence in Yindu was based on the family unit, not the patriarchal lineage group.

In this manner the "greater mixed dwelling and lesser clan dwelling" pattern of urban space arrangement was unified in the king's city. The nature of territorial relations of that city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 reflecting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kinship-like organizations, was considerably more highly developed than anything that existed in other regions in that age.